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新中国成立后，陆定一、李维汉、邓小平等八七会议的亲历者先后来到汉口实地寻访会址，八七会议会址的最终确定和布置就是以他们的回忆为依据，相互印证最终确定的。

依托八七会议原址，1978年8月7日，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1982年，八七会议会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为建馆之初的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大门。

（图、文由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提供）

# 目录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陈避馨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心耀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陈光 朱向梅  
杨华 李修文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鹏 甘琼 龙桃仙 吕照清  
刘重武 陆建军 陈立新 郑学军  
姚四平 曾艳红 谢受贵 窦梅  
潘红莲

主编：陈国方

副主编：华蕾

本期责任编辑：张川蕾

编辑：游迎

封面设计：王鹏

## 红色印记

<<< <

4 八七会议代表任弼时及其背后的故事 / 汪孟旋

## 文化传承

<<< <

8 灯彩、剪纸、圆木微缩技艺传承人刘国瑞  
/ 刘旻(口述) 雷迅(整理)

## 商聚汉皋

<<< <

12 不忘初心,感恩善为 / 喻鹏(口述) 陈剑(整理)  
16 二十五载,绽放在激光界的巾帼风采 / 付俊

## 精工匠心

<<< <

21 与钢筋水泥相伴的精彩人生  
/ 黄昕(口述) 白爱萍 李晓佳(整理)

#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 C O N T E N T S

2021年第7期(总第345期)

### 委员天地



25 尽心履职 描绘青山北湖发展宏图 / 乐敏霞

28 我当政协委员这几年 / 晏鸣

### 往事漫忆



32 宽厚的长者 卓越的领导——回忆王群同志 / 叶金生

36 木兰生态旅游区的诞生 / 计蕾

41 父母亲对光未然的回忆 / 曾宪德

### 史海钩沉



48 《长江日报》对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首个春节的报道  
/ 朱建华

### 都市史话



52 百子巷, 岁月如稠情如故 / 王琼辉

### 楚风汉韵



59 黄鹤楼轶闻 / 夏新民

主 管: 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 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 《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 《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 CN42-1056/K

印 刷: 武汉市仁达印刷厂

出版日期: 每月28日

定 价: 8元

地 址: 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246号

邮 编: 430010

电 话: (027) 82220667

(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ssl@163.com

## 八七会议代表任弼时及其背后的故事

◇ 汪孟旋

1904年，任弼时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唐家桥一个贫苦教员之家，原名任培国，曾就读长沙明德中学、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曾四度旅居莫斯科。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参加八七会议时，任团中央书记，以中央委员身份出席会议。在革命中，他一直以刻苦坚韧著称，少年时期就思想活跃，决定“毕业之后，欲志于工业”，走工业救国之路。八七会议是其参加过的高级别会议，也是其革命生涯的重要见证，更是早期共产党人为争取独立解放而不断探索的足迹。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先后征集了任弼时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使用过的小提琴、佩戴过的领带等生前物件，现已在陈列展中面向公众展出，以纪念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 任弼时与八七会议

1924 ~ 1927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后期，由于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进行镇压，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批批共产党员被杀害，中国大地被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共产党员数量从中共五大时的57900人锐减到10000人，迫于恶劣的革命形势，为了保存实力，中国共产党把革命力量转入地下开展秘密工作。

#### （一）于危难之际参加会议

在革命形势处于危急时刻的情况下，1927年4月，刚从苏联回国的任弼时满怀革命激情来到革命的中心——武汉。当时的武汉也正处于血雨腥风之中，革命的气氛一天天紧张起来。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4

月2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昌小学礼堂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会上任弼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五大会议后，紧接着任弼时在武汉主持召开中国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10日，大会在武昌都府堤第一小学礼堂举行开幕典礼。会议总主席任弼时致开幕词，并作了报告，报告中他坚持了五大通过的“决议案”的正确意见，确定了共青团当前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工农青年参加革命斗争、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促进工农和资产阶级的联盟为工农利益而斗争。”

为了扭转危难时局，新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决定在当年的汉口三教街41号（即现在的汉口鄱阳街139号）二楼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房间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召开了整整一天，主要内容是“纠正和结束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任弼时作为参会代表，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作了重要发言。

#### （二）在八七会议上作发言

会议共有三项重要议程，第一项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当前形势的报告，并宣读了一份由瞿秋白起草的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这份文件也就是八七会议的主要精神。第二项议程是通过了三项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第三项议程是选举产生临时中央政治局，任弼时当选为临时中央委员，作了相关发言。



任弼时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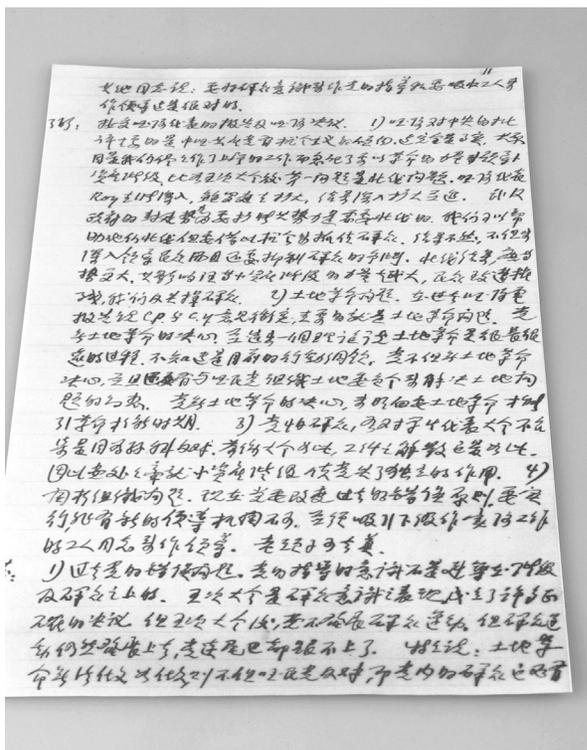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有幸于2004年7月从中央档案馆征集到一份稿件的复制件，记录了八七会议上任弼时同志关于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虽然我在馆内工作时间不长，但我特地找陈列部的同事借阅了这份稿件，阅读了任弼时在会上发言的内容。

他的发言内容主要有四点：一、共产国际对中央的批评，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倾向。这完全是事实，其原因是我们仅做了上层的工作，而忘了要以革命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二、土地革命的问题。党没有土地革命的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很远很长的过程，并且还有让国民党组织土地委员会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幻想。三、党怕群众，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去了独立的作用。四、组织问题。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并须吸引下级做实际工作的工人同志来做领导。

这份稿件虽然篇幅不长，但是言语精炼、针砭时弊，指出了当时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年轻的共产党员经过实践后总结的成果，更是得出八七会议精神的重要来源，是十分珍贵的史实资料。

### 八七会议背后的任弼时

任弼时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除了是国民革命中的“坚强骆驼”，在平时的生活中他还是位浪漫的才子。陈列在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展柜中的小提琴就体现了任弼时富有生活情趣的一面。2000年10月23日，任弼时的家人向纪念馆捐赠了这件文物。小提琴通长60cm，通宽21cm，通高4cm。琴身完整、琴弦老化，带有黑色皮质琴盒，总重量2139g。藏品保存较为完整，琴身有一



1927年任弼时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复制件

些磨损和刮痕。现为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馆藏三级文物。

在我馆文物仓库中，还有一条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会议时佩戴过的领带，2000年10月23日由任弼时的家人向纪念馆捐赠。领带通长114.5cm，最窄处2.5cm，最宽处9.5cm，质量28.2g。领带质地为棉麻纤维，样式为大方简洁的宽斜纹，由于年代久远，颜色略微发暗，底角有磨损。现为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馆藏三级文物。

据其女任远芳回忆，由于在苏留学的经历，任弼时身上具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气质。在女儿的眼中，父亲是个“文武双全”的人，不仅能够弹钢琴、拉小提琴、画画、写作、照相等，还会打猎。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任弼时可谓是洋气十足，极具文艺范儿。这正与我馆藏品所反映的信息一样，任弼时是个有情趣、讲究生活的人。

同时，他也是十分注重家庭的人。任弼时年幼时受到良好家庭环境的熏陶，形成了自身的优秀品质。作为儿子、丈夫、父亲，任弼时在家庭中所担任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尽职尽责且充满温情的。他尊重父母长辈，首次赴苏俄前夜，他饱含深情地给父母写了一封家书：“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抒发了不能常伴父母身边的无奈之情，同时表现出了舍“小家”为“大家”的高尚情操，拳拳孝性与家国之情都令人动容。

对待妻子，他细心呵护。妻子陈琮英年幼时没有进过学堂，任弼时便请父母帮忙让妻子接受教育。在他的耐心指导与帮助下，妻子陈琮英也成长为他的革命战友，二人并肩为革命事业奋斗。1930年5月，陈

琮英跟随任弼时来到武汉，为了掩人耳目，他们租了一间画廊，以画师的身份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战斗。1931年年初，任弼时接受中央指示，从上海赴苏区工作，陈琮英因临产在即无法同行，几天后她生下了女儿任远志。后又由于叛徒出卖，陈琮英被捕入狱。他们夫妻就是在患难中、在分离中、在共同的理想信念中一起坚守，彼此成就。陈琮英曾说：“与弼时一生一世足矣。”这场在封建礼教中包办的婚姻却产生了纯洁的爱情。后来，在给儿女们的信件中也能看出任弼时对妻子的关爱，他经常嘱咐儿女们要孝顺母亲，多陪伴母亲。

在子女面前，他也是一位称职的好父亲。尽管由于工作繁忙，与儿女们相处的最长时间只有4年零3个月，但他在精神上为子女鼓劲打气，在道德上为后辈树楷模，在家风上教育他们彼此关爱。在苏联留学时，他接受共产党性的教育和训练，在党内是出了名的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化”是他的人生准则和家教的核心，他带头从自身做起，从不向组织提要求，不接受额外照顾，示范于家人和后辈。在组织将他接到颐和园治病疗养时，他主动提出两大请求：自带干粮和水壶，不到餐厅用餐；在此期间不需要工作人员。他就这样教导子女们养成“凡事不能超过制度”、公私分明、自食其力的优良品格，这是为儿女的一生打造了一把“保险钥匙”，是对家庭的高度负责，是对子女们满腔的真爱。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年编撰的《任弼时书信选集》中，收集了任弼时从1947年到1950年间写给儿女们的27封家书，除了一封短信只谈及生活，其余26封均谈及子女们的学习情况和对他们的督促、询问。可见他对学习的重视和对子女们的殷切希望。

对待革命的战友，他勇于“同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却从不整人”。任弼时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一直坚定地支持毛泽东。1938年赴莫斯科时，他向共产国际强调“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对当时的共产国际表态支持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又不因此徇私情，对江青一直坚持原则，不给特殊照顾，康生等人对他一直是敬畏交织。任弼时能严格要求别人，恰恰在于自己一身正气，只讲奉献不求索取，正如古语所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在北京逝世。后人有关任弼时的诗云：党内领袖中，弼时足称贤。如今，任弼时已经离开我们70多年，但其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所作的贡献渗透在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中，其不搞特权、注重家风、关爱他人、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已成为一座精神的丰碑，每每看到纪念馆里陈列的文物，就像看到一面可资借鉴的明镜，闪耀地照射着我们的一言一行。

（汪孟璇：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文博馆员）

## 灯彩、剪纸、圆木微缩技艺传承人刘国瑞

◇ 刘旻（口述） 雷迅（整理）

我的父亲刘国瑞，小名刘泥巴，汉阳鹦鹉洲人，1946年出生于一个民间工艺世家，自幼学艺，精于微雕、木刻、石刻、花灯、剪纸等多种工艺，尤以剪纸、微雕和花灯擅长。独创圆木制作工具和圆木用具微雕技艺，能在小于硬币、薄能透亮、细如发丝、高如米粒、窄如火柴棒的紫檀木上制作圆木用品和圆木工具，工艺精细，惟妙惟肖。在米粒大小的象牙上雕刻的唐诗被多个国家收藏，制作的传统花灯曾进京参加亚运会陶然亭灯展，武汉剪纸曾赴多个国家文化交流。

父亲的雕刻技艺启蒙于祖父的箍匠（圆木用具制作匠人）技艺。他10岁前后帮祖父做圆木用具，更爱用斧、锯、刨、凿等工具制作小帆船、小水车、小纺车等玩具，十四五岁开始学剪纸、扎花灯，继而又学绘

画、书法、维修钟表、盆景制作等，多种技艺相互渗透而趋于精微。

1967年，父亲从武钢技校毕业后分配到武钢动力部任宣传干事，后调武汉冷冻机厂工作，从学放电影到研究声、光、电在艺术创作中的应用。1997年退休后专事民间工艺品创作，在住宅内自建“汉阳刘泥巴艺术工作室”，“刘泥巴”成为他的艺名并广为传播。

1990年，父亲与家人共同制作的花灯作品《猪八戒跳迪斯科》参加北京亚运会文展会，成为亚运会灯展中最引人注目、让人流连忘返的花灯之一，受到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的赞赏。另外，父亲还有数十件花灯作品漂洋过海，远销美国和东南亚。2003年，父亲作为武汉市民间工艺美术家

赴法国波尔多市参加“中法文化年”活动。在“圣诞集市”上现场制作以中国十二生肖为主题的剪纸作品，每天十多个小时疾刀创作，求购者络绎不绝，作品频频告罄。在2004年国庆节期间的知音婚典上，他设计制作的中国北方式、南方式以及缅甸式、泰国式花轿亮相，带来特别的喜庆和祝福。



2012年，刘国瑞在制作圆木微缩家具

父亲设计的龙船模型还被武昌造船厂选定为“乾隆一号”旅游船造型。2010年春节前，他率全家人为东湖楚风园“民俗花灯节”制作千盏花灯，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切好评。2013年，他随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及市委书记阮成发带领的交流团赴台湾苗栗，参加武汉民俗文化展，开幕式上祥龙点睛的花灯就是由父亲制作的。

作为湖北省工艺美术大师，父亲在他的从艺生涯中始终秉承一种承上启下、开拓创新的理念，执着地追求工艺技艺的完美。在传承古花灯技艺的神、形、透、光、彩五法的基础上，打破了原先的套圈法，在借鉴生物学原理的基础上采用肌理法，形成了花灯扎制的新风格，使作品更加传神及生动。他制作的动物、植物类花灯，白天是一件惟妙惟肖的雕塑，晚上是一件流光溢彩的花灯，令参观者叹服创作的精美而流连忘返。

父亲目睹祖父曾经大半辈子从事的圆木器具制作技艺在历史的长河中“断流”，他倾注3年心血，用贵于黄金的紫檀木按1:200的比例创作出一套包括斧、锯、凿、

钻、刨、钳、墨斗等的微型圆木制作工具47件，不仅惟妙惟肖，而且件件有榫头，件件能够使用，2002年荣获湖北省首届民间绝技绝活大赛金奖。接着，他还用高档红木创作了一套包括各种盆、桶及甑等的微型圆木用具。他说：“不能让中华民族圆木器具制作技艺就此消失被人遗忘。”圆木微缩技艺是父亲国内首创，将几千年来实用生活用具（圆木）、工具（制作圆木的工具）按一定比例微缩，既不失传统技法，又把传统实用的物件、将要失传的技艺以微缩的形式予以保留，以艺术收藏品的形式提供了实物展示，以便未来的人们在观看到这些实物时能了解历史上曾经的生活过往，做到了艺术与生活传承并举。2006年，父亲的微缩圆木用具、圆木微缩工具被列入武汉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15年，武汉非遗博物馆收藏父亲制作的圆木工具及圆木用具各一套。父亲不仅能在金、石、竹、木、骨上作硬雕，在陶瓷、蛋壳上作脆雕，还能在小如米粒的象牙上作微雕。他用象牙雕刻的唐诗宋词等微雕作品，被各界人士作为出访和对外文化

交流馈赠的礼品，已被美国、日本、新加坡、加拿大、泰国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友人收藏。

父亲对于雕刻的精通同样体现在剪纸上。剪纸艺术全国都有，也很普遍；但在技法上，一般分剪、刻两大类，以往作品表现手法比较单一。随着时代的发展，剪纸的技法是否能与时俱进、开拓新法，以满足人们审美丰富性及多样性的需求，这是一直徘徊在艺术家心中的想法。父亲开创性地使用了不同的技法，形成了剪、刻、撕、烧、刺绣、立体等六大门类的技法。在这些不同类别中也有不同的发展，不同的技法展现了不同作品的特色：剪，粗旷而多变；刻，细腻而丰富；撕，传神而生动；烧，形态生动；刺绣，色彩亮丽，华丽富贵；立体，惟妙惟肖。

手撕剪纸的由来：父亲的剪纸涉及方方面面，当他在进行动物类的剪纸创作时，

不管如何设计总觉得差了些什么，无法展现出动物的那种质感，只有形似却无神似。在他不断的尝试下，发现了宣纸纤维的特征，用手撕的宣纸会呈现出如绒毛般的极其细致的纤维纹路，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动物身上的绒毛，又不破坏动物的形态，这样才有了如今的手撕剪纸。火烧剪纸又分火烧绘画剪纸、火烧书法剪纸、火烧篆刻剪纸等。父亲制作的立体剪纸属全国首创，其实这说起来还是个绿色环保项目，当年父亲出门在外时总是收到别人发的传单或者小宣传册，觉得扔了实在是可惜，而它们同普通纸张不一样的硬度让他想到了“让剪纸立起来”。于是他将那些看似无用的传单等剪出昆虫的外形，大轮廓用手折叠，昆虫腿、须等用镊子塑形，最后用油漆对其进行上色。油漆所具有的光泽感，喷上时形成的不规则的纹路，以及固定后给剪纸带来的更加坚硬的外壳，

都让整个立体剪纸显得更加栩栩如生、形态逼真，这就是立体剪纸的由来。近些年父亲创作的刺绣剪纸也为全国首创，他把盘金绣、掐丝、珐琅、缠花等各种艺术门类融入了剪纸，使剪纸作品光鲜亮丽，或雍容华贵，或高雅清冷；在他脑海里还有更丰富的创意，制作了双平面剪纸，以提高剪纸的立体性、观赏性及艺术性。他所代表的汉阳剪纸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装饰趣



2017 年，刘国瑞在制作雕花剪纸

味，主题鲜明、线条秀丽、柔中有刚、阴阳兼刻、虚中有实，既有传统气息、又具有时代美感，在构图上既有对称，又求变化，疏而不空，花中有花；在刀法上，刀随人意，形出于刀，运转自如，不露锋芒。其作品按照传统方法手工装裱后，远销各国。2013年11月，《花栏》剪纸作品获2013年“武汉礼物”旅游商品大赛铜奖；2014年4月以《福》《时尚》作品参加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剪纸社“家国梦——幸福家庭展”，获优秀奖；2014年6月，花、鸟剪纸作品获武汉市江汉区“春天的剪影”二等奖。父亲还多次代表武汉剪纸项目参与国家和省里组织的对外交流活动。

通过这些不同的艺术形式，父亲所创作的不同作品，既有其艺术性，也有较高的观赏价值，部分引领作品还有较高的收藏价值；既有艺术品也有大众消费品，从而形成了以微缩收藏品为引领，以剪纸作品为基础的不同层次的产品范围，他助力推动这些产品走进百姓家，并不断走向全国及世界各地，为记录文化特色和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

父亲经常应邀参加中外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也十分乐意在社区、高校、小学、幼儿园传授剪纸艺术，他还应湖北美术学院邀请为大学生讲授工艺美术课，积极主动参加各种非遗传承的公益活动。2006年11月，汉阳刘泥巴艺术工作室取得了工商营业执照，父亲成为武汉首位“艺术商人”个体户。

父亲从艺60多年来成就斐然：

1990年，参加亚运会花灯展，获评“龙灯誉京都”。

2002年，获得湖北省首届绝技绝活金奖。

2003年，赴法国文化交流，其剪纸集为法国前总统朱佩收藏。

2004年，获全国剪纸比赛银奖。

2006年，赴以色列文化交流；被武汉市授予民间艺术家称号。

2008年，荣获汉阳区群众文化突出贡献奖。

2012年，参加美国旧金山纽约(联合国)民间工艺展；被武汉市文化局授予(非遗)武汉花灯扎制技艺传承人。

2016年，被授予武汉市文明市民荣誉称号；赴新西兰、加拿大文化交流。

2017年，获大城工匠称号；入选武汉好手艺民间工艺技能传承大师；被授予第五届湖北省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赴德国文化交流。

2018年，被授予荆楚工匠称号。

(刘旻：刘国瑞之女，武汉剪纸区级非遗传承人；雷迅：汉阳区非遗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副研究馆员)

## 不忘初心，感恩善为

◇ 喻鹏（口述） 陈剑（整理）

### 我的早年经历和创业之路

1965年，我出生于湖北省团风县团风镇一个文艺之家、书香之家。父母给我取名“鹏”字，寄予了望子成龙的期望。“长大后干什么？”20世纪70年代初，面对父亲的提问，我当时不假思索就回答：“想当一名电影放映员。”理由很简单，有工资拿、看电影还不要钱。那个年代，通过招工成为一名工人，是大多数城镇子弟最现实梦想。

我的父母都是团风文工团职工。要想在招工中脱颖而出，拥有文体特长是一个重要砝码。为了以后能当一名工人，父母从小开始培养我的文体特长。我记得，每天早上天不亮，我就和一群小伙伴手拉手沿着蜿蜒

的小路来到学校，借着星光，开始练功：空翻、拿顶。

晨练2个小时，30个空翻和拿顶，我常常练到汗流浹背。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以优异表现入选团风小学唯一的文体班。小学毕业，我获得学校乒乓球赛冠军，作为文艺表演队员，被派到乡镇演出，并顺利升入团风中学体育班。也许，就是那时刻苦的文体训练，磨练出我坚强的意志力和战胜困难的勇气。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地。1982年高考，我考入湖北科技学院物理系，成为体育特长班中唯一一位考入大学的骄子。1985年，凭借体育特长，我被分配到当时最好的省教育厅直属学校——武汉市水果湖高中，成为一名物理老师。在学校，我是4个班级的物理老师兼1个班级的班主

任，同时担任教工团支部书记，还经常组织开展各项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虽然事务繁忙，但学生的课业不能落下，教学质量不能落下，我不得不每天晚上挑灯夜战，批改作业、备课，经常忙到深夜。

1992年年底，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组建火炬房地产公司，我被省教育厅选派到公司出任副总经理。1993年，正在建设中的火炬大厦项目因政策变化停工。当年7月1日，我奔赴香港寻找合资企业。到达香港后，我打开报纸，看到两条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的信息：在广东省住五星级酒店不查结婚证，中国经济要实现软着陆。我感觉到，中国改革的洪流已经不可阻挡。

1995年，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起步。我果断放弃武汉火炬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一职，下海创建伟鹏集团，不再回头。

1995年年底，集团打造的首个甲级高档写字楼伟鹏大厦落成。但刚刚驶入商海的梦想之舟起航时就遭受重挫，1996年到1998年的三年间，伟鹏大厦没有卖出1平方米的楼盘，企业负债超过1亿元。当年，面对这个天文数字，我的信心几近崩溃。

1998年，我国住房制度发生转变。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政策，催生中国房地产行业进入黄金时代。我抓住机遇开发商品房楼盘，在武汉重型机械厂地盘上开发“伟鹏苑”一举成功。解套之后，当年卖不动的伟鹏大厦，我再也不卖了。作为创业路上的第一个作品，我选择了持有和珍藏。

经历这场企业危机，我找到做企业的“真经”：任何时候都要用发展的思维，依靠发展解决企业的困难和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向前。

2008年，房地产行业进入白银时代。

我提前布局、迅速转型，坚定地把金融与地产结合，引流金融“活水”贯通实体“血脉”。2015年，我在美国成立美国金融企业集团，打造武汉的“美国科技金融之家”。2016年，我在上海发起成立国内首家根据CEPA协议设立的合资全牌照证券公司——申港证券，并将申港证券华中区域总部落户武汉。

2018年，伟鹏集团联合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打造的光谷“硅谷小镇”开工建设。我充分整合其在金融证券、产业投资和国际合作等多方面优势，重点发展人工智能、物联网、集成电路和智慧城市等四大产业领域，建设海外人才中心、国际创新中心、孵化加速中心、总部企业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会议中心、文化艺术中心、创新创业街区、国际学校、国际人才社区等。

经过25年多元快速发展，伟鹏集团成长为金融证券、科技投资、房地产、科技园区开发及运营的综合性集团公司，拥有20多家成员企业，资产规模达520亿元。2019年，伟鹏集团被评为“湖北省民营企业服务业20强”。

### 我与武汉大学的不解之缘

提起与武汉大学结缘，那还是从体育开始的。1984年，在武汉大学水利电力学院举办的全省高校运动会上，我获得了十项全能比赛的第二名；后来当高中老师时，经常来武汉大学的足球场，和武汉大学的师生一起切磋球技。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教委领导给我颁发武昌区青年教师证书时，还笑称我是“物理教得最好的体育老师”。

我一直在水果湖高中担任物理老师，每天上下班都要骑着自行车穿过武汉大学。那时的我也有个梦想：既然我与武汉大学如

此有缘，那一定要真正走进武汉大学校园，才算圆满。于是，2006年我开始攻读武汉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终于成为了一名武汉大学学生。

作为武汉大学校董、校友，我与武大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武汉市首批招才大使，为母校招才引智是我众多身份的使命。在2020年11月25日武汉大学127周年校庆到来之际，我向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3000万元助建武汉大学高等研究院科研楼，希望能帮助母校更好地招才引智，为母校引育高层次创新人才提供科研硬件和平台的保障，为他们提供一展身手的舞台。

武汉大学在我的人生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学校的培育与鼓励是我前进的动力。虽然社会角色越来越多，但以武大校友的身份进入海外楚商联合会对我而言意义重大。捐赠仅仅是个开始，今后我还将在“人才强校 人才兴校”上助力母校，为母校引进更多的科研人才，筑造更加美好的科研环境和平台，希望其早日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

### 不忘家国情怀初心

我曾在武汉大学第六届校友会珞珈论坛上深情感慨：“从武大校园到东湖高新，从美国硅谷到中国光谷，无论我的梦想是什么，家国情怀就是我的初心。”

无论做什么，我一直秉持这个初心。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我身在海外，考虑到疫情给国内带来的不利影响，我第一时间在美国成立医疗防护物资采购团队，成立“抗疫工作领导小组”，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带领海外侨胞购买国内所需物资。

我个人累计为湖北抗疫捐赠现金超1360万元，作为侨领，我发动华人华侨社团组织支援抗击湖北疫情，累计号召捐款捐物近2亿元。

疫情后期，我回到武汉，带领企业积极复工复产，加大投资力度，助力疫后经济重振捐款达3140万元，积极配合省委、省政府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场战役，多领域助力湖北武汉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我走访全国七大省市，邀约省、市统战部领导及侨界代表近百位，出席2020年华创会。作为侨领，我获得了《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侨联、《长江日报》等主流媒体及社会各界的赞誉，并荣获“2020年湖北五一劳动奖章”及“抗疫突出贡献奖”。

不仅仅是助力抗击疫情，我还长期参加公益慈善事业，积极回报社会，关爱民众。近四年来向社会各界捐赠善款超过7400万元，广泛开展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承担社会责任，为脱贫攻坚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为侨领，我担任着众多社会职务，逐渐探索出了“企业+侨团+商会”的扶贫新模式。发挥企业的引领作用，伟鹏集团年均对外捐赠善款近2000万元。我发挥外事侨务优势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带领广大海外侨领侨胞参与家乡精准扶贫。

2017年9月29日，武汉市黄冈商会正式成立，我出任会长。作为会长，我积极参与脱贫攻坚、能人回乡投资，关注教育事业、文化发展，努力用行动回馈家乡、造福乡亲。

2017年10月，我向黄州李家湾捐款10万元，助力精准扶贫；2018年1月，参与黄冈“千企帮千村”脱贫攻坚活动，捐款170万元；2018年2月，捐款38万元，助力黄冈贫困县精准脱贫工作；2018年3月，向母校团风中学捐赠200万元，设立团风中

学教师奖励基金；2018年7月，捐款30万元，助力黄冈贫困县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2018年8月，捐款130万元，助力修建团风县人民公园；2018年9月，捐款40万元，助力黄冈“村村通”工程；2019年1月，我和团风县人民政府签约，投资80亿元建设团风特色小镇项目，助力大别山父老乡亲脱贫致富；2019年9月，捐赠40万元，在黄冈市贫困县学校建设“爱心书屋”。

作为武汉市黄冈商会会长，我的愿望是把商会组建成黄冈最强团队，争创中国一流商会，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

2018年6月14日，我当选为香港黄冈联谊会首任会长。我希望以乡情为纽带，把在港黄冈同乡紧密地团结起来，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大力促进香港与黄冈之间的经贸、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把香港乃至国外的先进理念、信息、技术和投资引进到黄冈，帮助促进黄冈的全面快速发展，把人杰地灵的家乡建设得更为美好。

### 做好爱国爱乡表率

作为美国侨领和武汉市“招才大使”，我于2016年引进美国富华信托银行中国总部、申港证券华中区域总部等国际化金融机构落户武汉，为湖北省、武汉市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奠定了基础。同时，2012至2019年，我作为美国加州湖北同乡总会会长，持续在美国承担了历届“中美双谷合作恳谈会”“海外高层次人才恳谈会”“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美国专场”“武汉城市形象推介会”“双谷双创·楚才回家”“招才引智万里行”等招才招商工作，促进了中美经济交流与对外友好合作。

2020年6月6日，湖北省委统战部全

国“两会”精神宣讲会在洪山礼堂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尔肯江·吐拉洪向港澳台侨界代表人士宣讲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和会议精神。我作为湖北省政协常委、武汉市黄冈商会会长、伟鹏集团董事长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言。

在会上，我表示一定会带领在鄂侨企当好疫后重振的积极推动者，加大投资力度，积极开展扶贫，为湖北、武汉疫后经济重振贡献力量。同时，定会做好爱国爱乡的表率，加强对年轻一代侨胞的团结引领，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湖北声音，为实现湖北深度对外开放、中外友好交流合作贡献力量。

这是我的发言，也是我的承诺。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践行着我的诺言。

（喻鹏：武汉伟鹏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北省政协常委，武汉市黄冈商会会长；陈剑：湖北日报集团楚天书局编辑）

## 二十五载，绽放在激光界的巾帼风采

◇ 付俊

我的身上有很多标签，我曾获得“武汉市十大杰出创业人物”“武汉市三八红旗手”“武汉市十佳创业女性”“湖北风尚女企业家”“激光领军人物”等荣誉称号。一重身份，一份责任，路兮漫漫，无畏担当。从一个人的柜台到创办激光产业集团，从不懂激光技术到缔造上亿元的激光帝国。25年走来，我从一个青涩女孩成长为睿智的女老板，以及一个肩负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我就是我，武汉华俄激光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激光界的巾帼之花。

### 从柜台到公司

我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系遗传专业。1993年，一个偶然的机，我发现做印章材料能挣钱，第一笔买卖净收入2000元，相当于我当年工作1年的工资。初尝胜果，我的创业激情一下被点燃，我找到了成功的乐趣，便辞掉中科院武汉分院的“铁饭碗”，

在鲁巷租了个门面，成立了武汉众泰雕刻经营部。

3年里，我一个人站柜台、联系业务，没日没夜地打拼，终于赚到了第一桶金。1996年，我看到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设备——激光刻章机，比起传统手工刻章，又快又好，完全可以取代手工刻章。

我迅速成立武汉众泰科技有限公司，并招聘研发人员，开始研制激光刻章机。当年年底，第一台激光刻章机面世。我和我的团队通过近半年的努力又成功地研发了一种体积小、对多材料的适应性和加工质量都优于国内同类产品的激光刻章机。产品一研发出来，就立即被客户抢走。“众泰研发成功泛材料激光刻章机”的消息在业界不胫而走，引起国内激光行业的轰动，谁都不相信一个生物专业毕业、对激光一窍不通的“门外汉”，竟然能发明全性能、泛材料的激光刻章机。直到有同行扮成客户到众泰科技明察暗访后，这才诚服于我抢得的市场先机。

通过这一战，我“巾帼不让须眉”的名声在激光界打响了。

### 从公司到集团

市场没有永远的王者，更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2003年，刻章机品种越来越多，2000元一台的光敏机，一秒钟就可以制作出一枚印章。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我宁愿冒险做别人没做的事，也不愿与人家进行价格竞争。”我决定转型。一次在广州参展，一名广告人来询问：“激光能不能雕刻一些花纹呢？”这句话打开了我的思路。

回到武汉后，我向一些高校科研机构咨询，得到的答案是，该技术很成熟，在大型制造中已被应用，但在小设备市场上还是空白。得知这一商机，我立即向科研机构购买该技术，开始转向生产工艺礼品雕刻机，这种机器可以在竹子、木头等材料上雕出美丽细致的图案。

因此，我再次一炮而红。但我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带领研发团队设计出一系列专利激光雕刻切割机，现在已成功研发出了六大系列近七十款设备，广泛应用于广告、工艺品雕刻、服装裁剪、绣花切割、皮革雕花等多个领域。

在求变求新中，我的众泰科技有限公司发展为集团，产品远销亚、欧、美各地。

市场的快速扩大，对众泰科技产能提出严峻考验。2006年，公司位于东湖高新区关南科技园内的新厂区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整个工业园占地30亩，总投资7000万元。工业园的建成投产为公司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后劲。众泰科技的高速发展也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广泛关注，我被评为2006年度“武汉市十大杰出创业人物”，

2007年“武汉市三八红旗手”等。我成功完成了从一个商人到企业家的转变。

### 跨国引进俄罗斯技术

都说每个企业家就是一盏灯。我深刻明白，公司越大，意味着责任越大，人们的期待也越高。每一个员工背后都是一个家庭，这些家庭对我来说是沉甸甸的、意义非凡的，而我必须做好掌舵人，永不止步，带领大家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

2007年年底，金融危机初露端倪，我随湖北省科技厅、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湖北省暨武汉激光学会共同组织的中国湖北省激光技术参展考察团，赴莫斯科参加“2007国际光子展览会”。在访问俄罗斯期间，我敏锐地察觉到激光金属切割的市场前景和俄罗斯具备的世界领先水平的激光技术，及时与俄罗斯TETA公司建立联系，并达成将大幅面激光切割技术引进到中国实施产业化的意向。经过一年多的谈判，武汉众泰数码光电设备有限公司、中国湖北中科对外科技合作有限公司、俄罗斯专家三方达成协议，创办武汉华俄激光工程有限公司。此后，华俄激光开始专注于生产大幅面金属激光切割机，国内研发团队多次赴俄罗斯学习大幅面激光切割机技术，俄方也多次来武汉指导切割机样机的研制，该项目被列为中国、独联体、东欧国家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

通过对俄罗斯先进激光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华俄激光在样机研制过程中实现技术创新和项目改进28项。2009年，中方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幅面金属激光切割机面世并实现销售。我代表华俄激光与“武汉·中国光谷”激光行业协会会长朱晓、中科对外交流中心主任邓智勇、俄

罗斯技术专家等一同到现场考察客户设备使用情况，并组织湖北省科技厅专家对此项目进行科技成果鉴定，结论为“填补了该类型国内空白，技术水平达到国际领先”，被武汉市、东湖开发区评为“自主创新产品”并获得国家专利。

2010年4月，华俄激光推出专利产品大幅面金属激光切割机，一经上市即得到市场的充分认可，首批生产10台，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为此，我再次投入资金扩大生产规模，将大幅面金属激光切割机投入量产，当年实现销售收入2000多万元。

随着业务量的突飞猛进，公司进入了发展快车道。从2011年开始，公司逐步成功研制出YAG 750W激光切割机、500W单驱/双驱光纤激光切割机、1000W/2000W/3000W/4000W全封闭交换式光纤激光切割机、管板一体机、专业切管机等系列精品，投放市场后深受业界好评，远销德国、波兰、西班牙等十多个国家，并返销俄罗斯，年销售收入实现翻番。公司也因超快的成长速度和极强的研发能力荣获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第一批“瞪羚企业”称号，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我凭借在激光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荣获“湖北风尚女企业家”称号，并成为洪山区政协委员。

成为激光切割设备优秀供应商，这是我当时的期望，显然我做到了。而我最终的目标是，成为全球领先的行业领军企业。金字塔的顶端，越往上越难攀登，但我们不畏困难，相信目标终有实现的一天。按照华俄激光成立之初的长远规划，目前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要做就做全球领先，2012年，我调整研发战略，与俄罗斯方面达成深度合作协议，成立了由华俄激光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武汉希利激光技术有限公司，从事

激光腔体技术及相关器件的开发，投入大量精力在尖端激光焊接技术和激光焊接装备的研发、激光焊接工艺的探索以及激光焊接设备的推广应用上，为新能源、光通信和消费电子等领域提供最快捷、专业的行业应用综合解决方案。同年，华俄公司研发的两款产品获得“中国设计红星奖”，大幅面激光切割系统被列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科学技术发展专项资金”第一批创新项目，公司技术总监傅杰博士作为该系统主要负责人入选“3551”人才计划，公司俄罗斯籍技术专家西里切夫·奥列格博士与塔拉索夫·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博士分别获得湖北省政府颁发的“编钟奖”。

我紧盯世界先进技术发展方向，以市场需求和技术领先为导向，加大加快产品研发创新的力度和速度，并始终紧密地维系中俄技术合作，从2018年年底起，我抓住机遇不遗余力地筹划推进“中俄激光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的审批、立项、筹备、招才引智等各项工作，准备引进更多俄罗斯激光领域顶尖技术专家，针对激光智能制造“卡脖子”技术，进行中俄联合攻关，支撑华俄激光的产品成为中国领先、国际一流的激光智能制造装备，助推华俄激光提质增效跨越发展。

### 自强不息 成就凌云之志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尽管华俄激光在我的带领下已经成长为一棵行业大树，但我却从未因此稍作停歇，而是以坚韧和执着的创业精神，绽放出灿烂的商界巾帼风采。

如今，全球激光切割技术不断成熟，为了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华俄激光进一步丰富产品线，研发出超大幅面如9020光纤激

光切割机，高功率如 6000W/8000W/10000W 全封闭交换式高速光纤激光切割机。随着激光切割设备朝着自动化和智能化方向迈进，我带领研发团队经过两年的探索及研究攻破技术难题，于 2018 年年初隆重推出激光切割自动化产线配套解决方案：平板自动上下料高速光纤激光切割机、全自动专业切管机、自动卷料激光切割机等系列智能化产品，具备了从激光切割到激光焊接、从中小功率到 8000W 至 15000W 的全覆盖能力，具备了为客户提供智能化激光切割产线的软件编写开发、硬件设计制造的综合实力，迎合了客户的多种选择和需求，推进了智能化、自动化产品在行业内的应用。

在产能方面，为满足市场需求，占领高端市场，我于 2017 年成立湖北华俄激光科技有限公司，与湖北京山市政府签下投资合同，建立华俄激光湖北京山激光产业园，用于生产大幅面、高功率激光切割机及激光切割自动化产线配套设备。产业园占地 10451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2949.47 平方米，可年产激光切割机 800 余台，实现产值 8 亿余元。

华俄激光的多方发力布局带来了订单的爆发式增长，公司逐渐成长为激光行业领导品牌，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逐步增强。这些市场表现，引来了客户的热捧、同行的赞许，自然也引来了国内知名投资机构的关注。我们相信，今后随着资本的注入，华俄激光的创新研发实力将进一步增强，一艘强大的激光航母将以勃发的英姿傲立于商海潮头。

### 大国工匠 情系荆楚

中国激光看武汉，武汉激光在光谷。华俄激光起步于“武汉·中国光谷”，从

2008 年正式成立至今，华俄激光始终践行着“创新、合作、共赢”的创新战略和“专注专业、精益求精”的企业精神，至今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品和销售体系，近 10 年斩获 50 余项国家专利，技术遥遥领先，产品热销国内外，创造多项行业辉煌，多位省、市级领导人莅临华俄激光考察，勉励公司继续向世界一流激光企业迈进。

公司推出的激光切割机系列，助力钣金加工行业，为钣金加工领域提供最快捷、专业的行业应用综合解决方案，产品不仅热销国内，且远销北欧、东欧、北美、南美、南非、东南亚、台湾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并返销俄罗斯，国际市场占有率逐年攀升。

公司秉承着“诚信为本、品质为本、创新为本”的企业宗旨，凭借雄厚的技术实力、专业的客户服务及自主技术创新体系，始终走在行业领域的前列，连续五年成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瞪羚企业”、国家级火炬计划及省“十一五”科技攻关项目承担单位、国家创新基金重点扶持项目、武汉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成功的路上没有一帆风顺，对企业家来说更是如此。从草根创业到行业翘楚，我带领华俄激光携艰辛与璀璨前行，遭遇了多少坎坷曲折，就收获了多少掌声认可。我非常看好激光制造行业在湖北武汉的发展前景，湖北作为中部崛起的领头羊，可以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也可以给西部地区提供经济发展的支撑，特别是在今天这个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时代，具有特殊意义。湖北科技优势和区位优势明显，人才的聚集和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地位是其他地区无可匹敌的。眷恋一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繁华。虽然我是宁波人，但我对湖北、对武汉有着一份很特别的感情，这里的大街小巷都是我

走过的路，是见证我青春的记忆所在，武汉有长江、有东湖、有黄鹤楼、有老汉口、有新汉街。提起武汉的一事一物，我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怀念，我一定要为我深爱的这个地方贡献所长！前方的路虽苦乐参半，但激励前行的是承载着梦想的不变初心——专注于激光切割领域，做大国工匠！

### 以人为本 厚德载物

人才是企业的财富，也是企业得以运作、发展、持久的基石，我们只有解决了人的问题，才能解决企业的发展大计。创办优秀的激光专业培训学校，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为企业输送技术人才，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早在华俄激光成立之初，我便积极整合公司优势资源，自筹资金，开办武汉乐博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定期聘请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学院的教授来校授课，也从公司选拔有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为学员做定向辅导，培养激光应用方面的专业人才，开创了激光行业自办学校的先河。通过与社会上大学、专业职校等配合，为广大学生提供免费就业实习的机会，提高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也为公司以及整个激光行业提供了大量的专业人才。

作为公司的创始人，我的行为举止无形中构成华俄激光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而我的人格魅力也汇聚成企业持续发展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公司近几年年会始终保留着一个固定环节，就是我亲手给工作满10年、20年的员工颁发千足金纪念金牌，感谢他们对企业金子般的赤诚。同时，还邀请员工家属参加公司的团年饭，为公司员工喜庆事件送上真诚的祝福，对员工伤病困难尽企业

所能予以帮助，这是润物细无声的关怀，也是最真挚情感的流露。

企业从社会中来，最终仍要回到社会中去，这不仅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企业的责任。我在公司高速发展、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不忘反哺社会。我在谈及自己创业的经历时说过，我们这一辈人，年轻时候的理想很朴素，国家培养了我们，就要回报国家。这种胸怀天下的精神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从未缺席。多年来，我在安排下岗职工、支持残疾人就业、自然灾害慈善捐款、关爱贫困儿童等方面默默践行着一个企业家应有的社会责任。2011年，更是为武汉市政府贡献数百万元的税额，成为纳税大户，默默践行着利国利民的准则。每每谈到这些，我说得最多的话是：“我还做得不够，这是我应该做的。”“实干强于空谈，机遇转瞬即逝，我们要快！”我不断完善着自身，发展着事业，壮大着企业，丰富着生活，服务着社会，创造着属于自己的辉煌人生。我在历经磨练中脱胎换骨为一名沉稳、果断、积极向前、永不言败的成功女性。展望未来，我仍不忘实业报国的初心，牢记技术强国的使命，加强激光核心器件技术攻关，引领武汉激光制造业发展方向，为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贡献更多力量。

一滴水，虽然微小，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缕光，虽然弱暗，却可以指明希望的方向。我用实际行动支持公益，履行社会责任，给需要帮助的人们带来温暖和希望，也阐述着自己的人生态度：以人为本，厚德载物。

（付俊：武汉华俄激光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市宁波商会常务副会长）

## 与钢筋水泥相伴的精彩人生

◇ 黄昕（口述） 白爱萍 李晓佳（整理）

我叫黄昕，现为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项目经理。

在一线耕耘三十余年，我先后主持过十余个大型项目，从大型公共场馆到重型机械厂房，无一不是武汉建筑业内影响深远的重大工程。多年来，我与钢筋水泥相伴，树起了座座武汉市地标性建筑，也砌筑了自己的精彩人生。

### （一）

进入建筑施工行业，缘于热爱。

1989年，22岁的我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后更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现已合并至武汉大学）毕业，进入武汉建工二公司担任施工员。不久，我参与了人生中第一个工程项目——武汉市杂技厅的建设。该项目为市重点工程，在当时备受瞩目。初生牛犊不怕虎，项目中的一切都让我着迷，看着杂技厅在自己和同事的手中一点点地成型，我成就感十足。从此，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一行。

感到自己的知识储备还远远不够，工作后不久，我选择回到母校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1996年，我获得了结构工程学硕士学位。

此时，摆在我面前的路有好几条，一是留校任教，二是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三是进入研究所搞科研，无论是哪一条看起来都很“光鲜”。可最终我听从了内心最真实的呼唤，放弃了舒适安逸的工作环境和旁人眼中的“阳光大道”，回到了武汉建工项目施工一线。

重返“战场”的我静下心来积累实践经验，主动协助参与武汉建工当时承建的最大体量项目——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的建设，帮助解决工程施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我边做边听边学边思考，将所学的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如饥似渴地汲取项目建设所涉及的各种知识，迅速地成长了起来。

深厚积淀后终将一飞冲天。重返武汉建工五年后，我独自接手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项目——武汉广播电视中心西区工程。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达7.4万平方米，高35层，工期紧，施工难度大。我带领团队利用创新的技术工艺，打败了施工路上一个又一个拦路虎。根据设计方案，我们需要将长74米、重54吨的钢桅杆吊装至32层楼的超高空间上。我带着团队经过三天三夜的测算，发现现有的塔吊高度根本无法满足一次性吊装的要求。经过几轮不眠不休的论证，我们最终选择用井字型钢架正倒混合吊装法，将钢桅杆分成17段制造，每段的长短不一，但质量不超过5吨，然后利用工地现有的168米高的塔吊垂直吊运，创造性地实现了这一操作，还总结了一套独特的《高空钢桅杆正反倒装施工工法》，成功申报了国家级工法。

从此，承接重大工程、高质量完成建设、申报工法及发明专利，几乎成了我管理工程项目的规定动作。我认为，做一个项目，总要留下一些有含金量的东西，企业如何体现创新？就是要将做过的工程形成论文、工法、专利，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2017年，黄昕在武汉天河机场T3航站楼施工现场

## (二)

辛亥革命博物馆建设是我职业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

2009年，武汉市委、市政府为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决定兴建辛亥革命博物馆。该项目是名扬海内外的首义文化区核心建筑，备受关注。项目整体建筑风格凝重，极富雕塑感，融合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和现代建筑特色，独树一帜的“V”形对称大跨度悬挑钢桁架结构，彰显“双坡屋顶”和飞檐翘角特质，平面立面不规则，外幕墙材质特殊，没有统一验收标准，结构极其复杂，工程难度特别大。

我把该工程当成艺术作品，精工匠造、潜心打磨，经过两年不懈努力，博物馆整体如“破土而出、浑然天成”的雕塑艺术作品，还原了辛亥首义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为了传承求新求变的首义精神，我结

合复杂多样的结构形式，和团队研究应用了“建筑业10项新技术”中10个大项、43个子项，总结完成12项创新技术，同时以辛亥革命博物馆工程施工过程为依托，总结出《复杂形态文化场馆类建筑关键施工技术研究与应用》等技术成果。该成果经湖北省科技厅组织权威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荣获2012年度武汉市科技进步

二等奖、2013年度湖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技术进步效益率达到3.6%。

最终，辛亥革命博物馆项目成功斩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中国钢结构金奖、湖北省建设优质工程（楚天杯）、湖北省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现场（楚天杯）、湖北省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全国建设工程优秀项目管理成果一等奖、全国工程质量管理小组一等奖、湖北省建筑节能示范工程、全国工人先锋号，还创造了2项国家级工法、9项省级工法、10项实用新型专利，发表了6篇核心期刊论文。我本人也因为贡献突出，在2011年武汉市纪念辛亥革命·武昌首义100周年工作中荣立三等功。

一项工程创造这么多科技成果，可谓是一个奇迹。但我更看重的是征服困难呈献精品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很艰辛，但我乐在其中。每一个项目都是我的孩子，倾注百分百的精力将孩子高质量地产出，就是我的使命。所谓“工匠”，其实就是忠于内心的选择，并坚持下去。

### （三）

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是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我做项目管理自有一套章法，总结起来就是12个字：“样板引路、方案先行、策划在前。”每一个项目，我都会结合周边环境，按照公司要求，根据合同约定制定明确的目标，既合理又兼具挑战性。

武汉天河机场交通中心（二标段项目）就是一个项目管理的典范之作。该项目是华中地区最大的交通枢纽综合体，总建筑面积近27万平方米。这个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庞然大物，在以我为总指挥的团队的努力

下，以“国家精品工程”作为项目控制目标，以“湖北省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现场”及“零事故率”为安全控制目标，历时两年，破茧蝶变，翩翩起舞，广迎四海宾客，实现了高质量履约。

这个项目推行的是总承包集成化管理，成立了质量领导小组，由我任组长，依据创建国家精品工程的规划，将质量创优目标层层分解，责任落实到人，定期召开技术质量会，汇总问题并及时监督整改。同时，通过对施工质量进行考核评比、奖优罚劣等方式，达到整体质量水平提高的目的。

武汉建工在天河机场三期项目建设中是最晚进场的总承包单位，却率先高品质完成了主体结构施工，得到机场三期前线指挥部的高度认可，被武汉交投集团授予“先进单位”和“平安工地”称号。

早在辛亥革命博物馆项目中，我就开始注重带团队和培养徒弟，多年积累下来，成果斐然。我认为比起建造高楼大厦，为企业发展培养人才、储备未来力量是更加艰巨的使命，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先后为武汉建工培养了7名项目经理、8名项目技术负责人，还有4位同事已经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我与团队成员之间既有上级与下属的配合，也有老师对学生的教导，更有朋友兄弟间的情谊。如今这些徒弟都已经成为独当一面的人才，作为曾经的领导、老师、朋友，我乐见其成。

### （四）

2020年新春的抗击疫情，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为刻骨铭心的经历。

2020年1月22日，腊月二十八，正在某项目工地的我接到了集团的急召，要求我

当天晚上按照“三区两通道”的要求完成武汉市第九医院一栋11层的住院部和一栋4层门诊楼近千平方米的隔离病房改造任务，以便尽快接收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当时工人们已返乡过年，建材门市全面歇业，人员、材料一时难以调集，我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疫情面前，我没有任何犹豫，戴着普通医用口罩立即投入了施工作业。我不眠不休地奋战在一线，不停地拨打电话组织劳务人员回汉，并派出自己的车辆接送，不惜以高价采购施工材料。凌晨三四点左右，正是施工进度吃紧、人员疲劳作战之时，我带头组织全体管理人员上阵作业。经过24小时连续奋战，改造任务如期圆满完成，院方验收后竖起了大拇指。

1月23日，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武汉建工又接到了抢建火神山医院的命令。十万火急！时间就是生命！二话不说，我主动请缨，调头走进火神山医院施工现场，担任医技楼和ICU片区的负责人。作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和共产党员，危难时刻，我不上谁上？

医技楼和ICU病房楼是火神山医院项目中主体和设备安装工程技术要求高、工艺复杂、施工难度大的功能区块。从进场第一天起，我就吃住在现场，每天只休息两三个小时，以冲刺精神和决战状态统筹制订施工路线图，克服时间紧、任务重、资源紧张、安全风险大等困难，尽全力组织施工。1月27日到1月29日，为了完成责任片区近5000平方米、2000立方米混凝土基础施工任务，我三天两夜60个小时未合眼，紧盯现场，组织协调人、材、机，确保基础施工任务按期完成。施工现场嘈杂、作业单位多、作业面狭窄，沟通交流全靠“吼”，让我一度失声说不出话来。

在全体施工人员的奋力拼搏下，火神山医院建设屡屡上演“中国奇迹”：一天时间里200多根6米高的钢立柱拔地而起；3天内3000多平方米的钢结构主体全部完工；7天完成包含3个CT室、1个负压生化实验室的医技楼和30张床位的ICU病房楼的装饰装修及设备安装调试……

回顾火神山医院的建设，我最大的感触是很累很疲倦，但是在医院正式启用收治病人的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 （五）

2020年11月，我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光荣地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这无疑是我职业生涯的最高光时刻，但我想得更多的还是自己的团队和项目，我觉得这份荣誉应该属于团队，属于武汉建工，属于千千万万建筑施工一线的作业人员，我个人只是代表他们站到了领奖台上。

我才50多岁，从来没有想过要退居二线。只有在工地，亲眼看到一栋栋建筑从无到有、拔地而起，我才感到踏实和幸福。

（黄昕：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项目经理；白爱萍：武汉市总工会《武汉工运》编辑；李晓佳：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办公室、办公室主任）

## 尽心履职 描绘青山北湖发展宏图

◇ 乐敏霞

我是2016年12月任青山区政协主席的，之前历任武汉市政协常委，武汉市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青山区委常委，青山区委宣传部部长，青山区总工会主席。

青山北湖地区位于青山区（化工区）东部，北抵长江，东邻80万吨乙烯工程，西接青山城区（武钢），南与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毗邻；包括化工区、青山区部分区域，面积近40平方公里，区域范围内涵盖化工区10个行政村，坐拥严西湖和北湖两个城中湖，水域及生态用地占比83%。该区域区位优势明显，生态资源丰富，城改工作稳步推进，实体产业聚集。

为深入贯彻实施“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促进武钢、石化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发展，为国家重化工业集聚区生态治理提供样板和借鉴，2017年，青山区委、区政府提出请生态当总设计师、建设北湖生态新城的发展战略。

青山区政协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高度关注北湖生态绿色发展，通过建议案、提案、调研视察、专题协商、专项监督、大会发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履职方式，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为北湖地区污水治理、生态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言献策、凝心聚力，有力助推了北湖生态绿色发展。

2017年5月，我率领区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就北湖生态新城建设到八吉府路武钢排污明渠和绿色南路、焦沙中路等路段开展调研视察，深入了解北湖发展总体设想和相关区块有关情况。当我们走在北湖土地上，已没有老北湖人描绘的当年“碧波万顷，荷塘苇海”的景致，感受到的却是青山区（化工区）作为武汉的重化工区，承载的工业废水、废气排放及工业污水、工业垃圾处理等方面的巨大生态牺牲和压力。我感到北湖发展任重道远，面临的问题就是北湖地区环境

污染较重、基础设施配套落后、可利用空间和土地有限及可投入财力不足，发展必须抓住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在污染治理和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夫。

2018年，在全国深入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武汉市实施青山区与化工区融合发展形势下，我们把“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列入区政协2018年度协商工作计划，组织委员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调研协商。为确保协商质量和水平，我先后主持召开三次调度会，就调研课题、调研方式、调研成果等工作进行部署安排和统筹协调。8月底，区政协组织召开“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议政性常委会协商会议，为北湖地区污染治理提出意见建议31条，区委主要领导出席，认为委员们的发言站位高、思考深、建议实，并要求相关部门吸纳采用。9月28日，《长江日报》对此次协商进行了专版报道。

为进一步改变北湖地区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逐步解决我区东部地区在全市发展进程中不平衡、不均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我在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还提出了《关于加快武汉东部重化工聚集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提案，同年10月，我率领区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就青山区（化工区）两区融合路网建设开展了督办视察。组织委员高度关注青山区（化工区）两区路网、水网加快融合，积极建言资政，有力推动了北湖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2018年下半年，青山区委、区政府提出建设长江北湖生态绿色发展示范区，打造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的产业转型绿色发展的先行区示范区的发展战略。长江北湖生态绿色发展示范区选址北至长江，南至严西湖，东至八吉府大街，西至焦沙路，用地面积38平方公里。同年11月，国家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召开《武汉市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实施方案》咨询评审会，我区的长江北湖生态绿色发展示范区方案被纳入其中，示范区较为成熟的严西湖北岸水环境治理等4个项目接受了国家发改委组织的专家咨询。

区政协围绕中心，顺势而为，2018年年底和2019年年底，区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四次会议连续两年提出《关于加快长江北湖生态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建议案，从优化土地空间布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为推动建议案办理，我组织区政协常委会议组成人员视察北湖闸渠和北湖大港扩建工程，组织委员实地调研白羊山还建房二期和烽火锐拓项目，召开建议案办理协商座谈会，围绕“治污水、拆违建、建新城”深入协商建言，区政府相关部门积极采纳。

为进一步助推长江北湖生态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我还利用市政协履职平台，积极为北湖生态绿色发展鼓与呼。2019年年初，我在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加快建设长江北湖生态绿色发展示范区》的提案，该提案得到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将青山北湖生态示范区纳入我市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成立了北湖产业生态新城领导小组，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市政府分管领导、宝武集团分管领导、青山区委主要领导任副组长，市重点办、发改委、规划局、经信局、财政局等市直部门、青山区政府、宝武集团城市新产业中心、武钢集团不动产中心领导为成员，研究解决推进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协调推进各项建设工作。市发改委、规划局、经信局、生态环境局、园林和林业局等相关部门积极办理，并及时将办理情况进行回复。同时，我们向市

政协反映的《关于改善武钢北湖地区生态治理发展环境的建议》《关于加快长江北湖生态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建议》等社情民意信息，先后被市委《每日汇报》和市政协《社情民意》单篇刊用。

在连续三年对北湖的关注和调研中，我更加深刻感受到：天然湖泊北湖本来拥有近200公顷水域面积，近7公里岸线，如今萎缩成一个地域概念，水体变为黑臭和劣五类，从优于水到忧于水。我们规划发展长江北湖生态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美丽青山，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我们必须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政府和市直部门的支持指导下，在青山区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下，持续加大北湖地区污水治理和生态环境改善力度，让青山人民享受到更多环境治理“红利”。

为更好地推动北湖污水治理和生态修复，进一步凝聚起全区人民把北湖环境污染治理好、把新城建设好的共识，我带领区政协委员围绕加强区域黑臭水体治理、水生态修复等主题深入调研视察，形成13篇高质量的调研报告。2019年9月，召开“实施‘一湖（河）一策’，打赢碧水保卫战”议政性常委会议，协商提出请生态当总设计师建好青山绿水红钢城、统筹推进水体污染综合治理、完善河湖管护体系等意见建议，区委、区政府领导出席会议，并要求相关部门吸收采纳。

围绕沿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开展主席会议成员视察活动，为推动北湖生态环境治理建言。青山区委、区政府积极采纳区政协提出的意见建议，自觉接受区政协的民主监督，着力解决北湖生态环境治理难题，在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加快长江北湖生态绿色发展示范

区建设步伐。各责任单位持续深入开展产业空间发展规划编制、“散乱污”企业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工作，强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实落地，示范区建设取得较好成绩。北湖闸渠、严西湖北岸水环境整治及生态修复（一期）、北湖港及北湖南港整治、八吉府明渠整治、北湖小港整治、红旗渠综合整治、东部地区污水连通管建设等工程清淤截污工作均于2020年年底完成。北湖大港预计2021年年底完工。2020年6月~8月，国家、省、市有关部门多次到青山区调研生态绿色发展工作，对长江北湖生态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表示高度认可。

回顾青山区近年来推进北湖生态绿色发展的历程，倾注了我们政协人的情怀和奉献。我作为武汉市政协委员、青山区政协主席，在武汉市政协的指导和中共青山区委的领导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始终抓住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根主线，努力描绘武汉、青山东部长江北湖生态绿色示范区这颗璀璨明珠的美好未来，并为之尽心尽力。看青山，东方欲晓；绘宏图，云蒸霞蔚。

（乐敏霞：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青山区政协主席）

## 我当政协委员这几年

◇ 晏 鸣

我与政协结识较晚。2005年，我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开始了我的职场生涯，因为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我先后在国企及民营企业从事管理类的工作，此前从未担任过政府相关的社会职务。2017年，因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领导的认可和推荐，我开始与政协结缘。五年的履职经历，如今回首，都是我人生路上弥足珍贵的回忆。

### 政协委员的第一年

2017年2月1日，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在这天，我接到通知被成功推荐为政协武汉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由于我从事金融行业，正好归入了政协的经济界别。那时我正在外面办事，立马拿出手机登录武汉市政协网站，在政协委员名单上顺利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我很激动、很兴奋，但更多的竟然是惶恐。

是的，惶恐！

虽然我工作十多年，在职场上也经历了诸多考验，已然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人，但彼时对政协的了解还仅限于教科书，对于政协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委员如何履职尽责，我的认知还相当缺乏，再加上得知身边的政协委员们都是各行业各领域的拔尖人才，我一度担心自己会给大队伍拖后腿，所以心情十分复杂。

2017年2月13日，我以新一届政协委员的身份在武汉剧院参加了武汉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位列第十四组，坐在会场的左手边。会场上，大家都佩戴着红彤彤的出席证，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庄严气氛。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出席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大会历时五天，让我感慨颇多，这次我不再是通过新闻媒介接收会议的信息，同各种关键词和数据也不再有任何距离感。

大会期间，我作为一名新政协委员投出了第一张正式选票，选举产生了政协的新一届领导班子。胡曙光主席上任致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定力、智慧、温度、担当，这就是政协人。

刚开始加入政协这个大家庭，我跟所有新人一样，都有点无所适从，好在政协的委员队伍建设模式已经成熟。市政协经常组织新老委员开展学习培训、座谈交流、视察调研活动，我也逐渐领悟到了政协委员的真正内涵。在政协这块精心耕耘的土地上，我像一棵幼苗一天天成长起来。

### 政协委员的第二年

2018 年是国家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我作为政协委员履职的第二年。在我看来，政协委员既是一个政治荣誉，更是一份社会责任，我经常提醒自己，从日常本职工作着手，积极建言献策。

这几年，除了公司日常运营和管理，我引进和运营了一个国际众创空间，同时还是上海一家专业投资公司的高级合伙人，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创业孵化和股权投资上面。都说基层是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最好的营养地，因为一切实际工作

者必须向下做调查，毕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正好我的工作需要与各个阶段、各个行业的企业和创业者打交道，可以深入到最基层。以前我看项目最关心的是企业的商业模式、发展前景、成长空间和估值，现在因为政协委员的身份，我会更留意企业和创业者们在发展过程中的诉求和遇到的困难。

我清楚地记得，有个做智能家居的项目创始人跟我聊天时说，政府每年出台很多政策，出发点固然很好，但很多对他们起不到作用。我感觉很奇怪，因为在我的认知中，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会经过长时间的研究。细问原因，那位创始人向我解释，政府支持创业的政策不在少数，不是政策不好，是有些扶持政策不匹配创业团队现状，大多政策对企业的经营规范要求较高，无论是人员配置还是税收情况，都有较严格的前提限定，而对于初创企业来说，早期很难把这些做到全面且规范；还有一点是政策信息相对分



2017年2月，晏鸣委员（二排左一）参加武汉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留影



2019年年底，晏鸣委员在东湖高新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新春茶话会上发言

散，公司人员精力有限，有时候会错过重要的时间节点。经过调研，我发现这个问题真实存在且不在少数，于是在随后的政协工作会议上反映了这个情况。惊喜的是，后来我发现信息平台上出现了政策的汇编整理，并且会定期更新，对于企业的适用范围也有了更人性化的破格申请。

虽然这是小故事，但让我明白了，政协委员的职责就是把最基层、最底层的情况和问题摸清楚，把意见和建议提上来，这样才能认清形势把准脉络，对症下药才会正本清源。

### 政协委员的第三年

201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经过两年的学习和体验，我对于政协委员的这重身份，已经了然于心，对履职工作也更加得心应手。

这一年，我带领团队承接了多项课题，

借助这样的机会，开展了深入持久的研究工作。我走访调研了企业、银行、投资机构、保险机构、担保机构等不同的社会主体，做了大量的信息搜集工作，最频繁的时候，我一天跑了5家机构。虽然身体很累，但感受更多的是充实感和成就感，这种直接的对话，让我获取了很多无法

从书本上得到的信息和认知，帮助我发出真正有用的声音。

涓涓细流，汇聚成溪，调研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我先后向市政协提出了《关于合理运用政府引导基金带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建议》《关于设立早期投资失败补偿机制的建议》《关于支持民营企业转型期和新兴产业减税发展的建议》《关于中国（湖北）自由贸易区科技金融政策和制度创新的建议》等多件提案，这些都是事关我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企业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其中，《武汉自贸片区科技金融政策和制度创新的建议》提案在《党外人士提案意见》第九期刊登，《关于中国（湖北）自由贸易区科技金融政策和制度创新的建议》被湖北省政协采用。在市长与政协委员座谈会上，我根据企业调研时发现的问题，作了《关于支持民营企业转型期和新兴产业减税发展的建议》的发言，也受到了领导的肯定。

我欣喜的不是对我个人的认可，而是企业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

#### 政协委员的第四年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年伊始，武汉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封城、抗疫、驰援，全国的目光一次次聚向这座英雄的城市。

我是一个武汉人，我也是一个政协人。

我带领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新阶层人士先后捐赠数百万医疗防护物资和200多万元善款，支援一线医疗机构；参与上海善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定向支援10万件医疗物资以及数万只口罩；参与武汉攀升科技有限公司捐赠宜昌慈善会100万元、黄陂慈善会50万元。为了让物资和善款尽快发挥作用，我联合一些朋友亲自运送这些物资到前线，解了燃眉之急。

这次疫情对各行各业都造成了强烈冲击，越来越多的企业停工和供应链中断，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我挨个联系了身边的企业家朋友们，听取他们最迫切的需求，并发动他们向身边人搜集此类信息。最后通过思考汇总，我向市政协提出了增加信贷额度、社保返还、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发挥国有融资担保平台作用等一系列扶持企业稳定发展的建议。我真心希望能够借助政府的力量，帮助企业度过眼前的危机，而政府相当给力，一系列高含金量惠企扶企政策的出台，便是最好的回馈。

面对疫后经济重振和城市发展的艰巨任务，我与其他界别委员各自发挥党派和界别的优势，一起围绕当时的形势展开了多次探讨，受益颇深。通过经济形势研判，并基于此前的研究成果，我提出《关于加大金

融扶持力度稳定我市中小企业发展的建议》《加强工匠人才培养，建设我市产业大军》《关于大力支持留学归国人员就业创业，吸引高端人才回汉的建议》等一系列提案。我自觉突破了以往熟悉的行业领域界限，对于民意传达和建言献策，有了更深的理解。

#### 政协委员的第五年

2021年是我当政协委员的第五年，我仍然坚守在政协的一线，希望在平凡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光与热。

回首我作为政协委员的履职之路，在市政协领导和机关各部门的培养下，我在市政协这个政治平台上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提升，无论是语言表达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和体察民情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可以说一路走来，政协一直伴我成长、教我成才，也让我结识了无数的良师益友。

热情源自内心的担当，执着来自肩负的责任。五年的政协履程，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政协力量。一个人的力量固然微弱，但你我皆是这社会前行的光，众人携手，这盛世，终将如你我所愿。

（晏鸣：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光谷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善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

## 宽厚的长者 卓越的领导

### ——回忆王群同志

◇ 叶金生

年轻时常听新洲人讲，新洲出大干部，解放前有万耀煌、徐源泉等，东陵盗宝的孙殿英只不过是徐源泉的部下；解放后有魏文伯（曾任上海市委书记）、万学远（曾任浙江省省长）、王群等。

真正见到王群，那还是他接任武汉市委书记后不久的1982年夏天。当时下暴雨，花桥、惠济路一带渍水严重，水中漂浮着面包等点心，偶尔还可见到鱼，可能是后湖的鱼池被水漫堤了。自行车没法通过，回市政府还有一段路，又到了吃中午饭的时间，我就到市委食堂去吃饭。因我曾在市委办公厅工作过，比较熟，就径直去了食堂。那时的社会风气很好，市委就一个大食堂，吃饭的人都自觉排队。物资匮乏的痕迹还未褪去，食堂里没有空调，只有几台电扇在那儿摇头晃脑地摆动着，好像欢迎着来就餐的人们。我走进食堂，看见排队的人较多，就准备

找一个方桌坐一下，等一等。只见桌旁坐着的一个50多岁领导模样的人向我招手，让我坐在他那儿一起等。刚一坐下，他就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做什么的，姓甚名谁，我一一作答。他和蔼的态度、亲切的语气、平实的交谈中，透露着深邃和感染力。我心里想，这和我所见过的领导有许多不同，没有架子，不摆谱，善于调研，连吃饭的空隙也不放过，会利用时间……正在我过电影般地遐想时，食堂的朱班长大声叫道：“王书记可以打饭了。”他大步流星般地走向卖饭窗口，我亦紧随其后，打了饭就找个近一点的桌子坐下吃饭。这次的邂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决定实行干部离退休制度，一大批经过革命战争年代考验的老干部逐渐淡出工作第一线，安度晚年。同时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

化的要求，随即选拔任用了一大批“四化”干部。在1982年11月召开的中共武汉市第六次党代会上，44岁的科委副主任吴官正当选为市委常委，第二年在市人大会议上又当选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吴官正除了符合“四化”条件外，他在科委副主任职位上工作8年，对武汉市情的了解、实际工作经验以及开拓创新精神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接着又选拔了一批青年干部进入领导岗位。王群主张：符合条件的优秀青年干部要大胆选拔任用，工作需要的可以一步到位。在市政府班子的配备上，把顾全大局、工作经验丰富的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王杰留在班子里，支持吴官正工作。又让黎智老市长担任新成立的体改委主任，思考、谋划武汉的改革。

吴官正担任市长后勤奋敬业、开拓创新，吃住在办公室，晚上常到有生产任务的企业去了解生产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事先从不打招呼。市长轻车简从、身体力行，赢得了人们的认同。在重大问题上，吴官正总是先向王群汇报，取得共识之后再组织落实。为了杜绝决策的失误，市政府在全国率先成立咨询委员会，聘请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当主任，并提出没有经过专家论证的方案不决策，没有两个以上比较的方案不决策，把权力与智力结合起来，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得到了王群的大力支持和赞赏。在咨询委员会成立时，王群亲自到会讲话，提希望。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使咨询委的专家们觉得大有可为，工作开展得非常活跃。

其身正不令而行。王群遇到重大事情总是亲力亲为，深入一线，取得第一手资料然后再作决策，付诸实施。继1982年暴雨渍水后，1983年夏季又来了一场更大的暴

雨，汉口许多地方一片汪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滂沱大雨，汉口地区的抽排能力根本不适应，到处是渍水，有人戏谑，这就是“海”。居民们毫无准备，不仅出不了门，一楼的住户基本上泡在水中。万松园路那儿有一米多深的积水。王群、吴官正等人乘橡皮船察看灾情，到万松园路后就挽起裤子，趟水前行。居民们本来有很大意见，听说是市委书记、市长趟水察看灾情，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心里平和了许多。而王群、吴官正则更加感觉到治理城市责任的重大，至少不能让城市居民泡在水中过日子吧！媒体报道书记、市长趟水察看灾情的消息后，领导者的亲民形象燃遍大江南北，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同和支持。王群、吴官正商定，立即做两件事：一是请老市长黎智带领有关部门到北京汇报，特别是建设部，请求给予支持。因为黎智人熟、好沟通。在北京期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建南相继到酒店看望了黎智。建设部听了武汉渍水严重的汇报，并看了渍水录像，表示给予支持和帮助，最后拨了一笔专款；二是决心改造黄孝河、疏通排水渠道，加大抽排能力，切实解决渍水给城市居民生活造成的困难。武汉空军非常给力，主动请战，要求共建武汉，派出一批指战员共同挖掘黄孝河，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战，汉口的“龙须沟”——黄孝河面貌一新，抽排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从20世纪80年代起武汉的改革就声名鹊起，常常成为新闻媒体报道的热点。在重大的改革措施上，王群、吴官正总是不谋而合。武汉柴油机厂生产过全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在同行业中曾享有盛誉，1958年毛泽东曾到该厂视察。后因管理混乱，纪律松懈，浪费严重，产品质量每况逾下，废品不断增多。为了积极推进企业

改革，寻求新的路径，吴官正向王群说了自己的想法，想聘请在柴油机厂当技术顾问的德国退休专家格里希当厂长，把德国企业的管理经验引进到武汉的企业中。王群一听，马上同意。但引进“洋人”当厂长，全国没有先例，要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同意后才行。经过申请，国家有关部门同意后，格里希走马上任，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和严格管理。散漫惯了的人员遇到严格的管理，很不习惯，滋生抵触情绪，“洋厂长”的改革措施进行不下去。吴官正得知这个情况后马上向王群报告。王群认为，格里希是个外国人，是来帮助我们的，严格管理是企业的一种现实需要，应该支持。他们商定，请出对企业熟悉、又当过市总工会主席的李梅芳带几个人去做厂里员工的工作，支持格里希的改革和管理。经过艰苦的工作，思想认识基本达成共识，一些改革的措施得以实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柴油机厂的管理水平、产品质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柴油机气缸杂质从5000毫克降到100毫克以内，居国内领先水平，废品率由30%~40%降至10%以下，产品的使用寿命由3000小时增加到6000~8000小时，翻了一番多，武汉柴油机的名声又恢复如昔。格里希对武汉柴油机厂的贡献，引起国务院的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姚依林接见了格里希。

现在的人多数不会想到蔬菜还会计划供应，拿钱到菜场或超市去买不就行了？但在那个年代人们还不知道超市是什么。为了保证城市居民吃菜，当时的政府是煞费苦心，周密安排的。按当时的城市人口人均27平方米的蔬菜生产面积落实，确保每人每天500克菜，淡季则是400克，政府每年还要补贴900万元。即便如此，种菜的、卖

菜的都没有积极性，吃菜的居民意见更大。常常是“黄瓜黄，瓠子长，苋菜长得马鞭样”，能吃的就不多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市委、市政府下决心改革蔬菜产销体制，砍掉中间环节，放开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刚开始价格波动较大，消费者意见多，市委、市政府压力很大。有的地方曾经放开过蔬菜价格，由于价格上涨，消费者意见大而又退回去了。面对汹涌如潮的舆论，王群、吴官正等人研究，只要是符合改革方向，就应坚持下去，承受阵痛，闯过这一关，情况就会好转。但工作要做细，耐心疏导的同时，继续给予财政补贴，大力增加蔬菜副食品的供应量。“价高引远客”，外地的蔬菜也纷纷涌向武汉市场，货源一多，供大于求，价格便逐渐趋于平稳，这一关闯过来了。

在省会城市中，武汉是第一个被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为计划单列，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城市。改革试点涉及到诸多方面，但重点是三个：一是赋予武汉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二是下放在汉的中央、省属企业；三是财政单列，纳入国家财政平衡。改革的每一步都十分艰难，但最难的莫过于财政体制改革了。1984年夏天，由国家体改委牵头，国务院有关部委参加，奔赴武汉，帮助制订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各个部门的试点方案虽然不一，但经过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协调，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唯独财政分成比例的划分，久争不下，经过财政部预算司王复处长反复协调也未果，最后只好拿到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周太和、试点司司长吴佩纶、财政部王复、市长吴官正等受邀参加（吴官正同志叫我去做记录）。会上各自陈述理由，基数如何划分比较合理。省里一位主要领导认为，武汉财政困难，是因为企业效益差，

上缴少所致。市长吴官正认为，实行财政分灶吃饭以后，武汉的财政留成比例只有11%，100元钱要上缴89%，能不困难？武汉财政困难，城市维护费少，历年欠账多，没钱修路。这次只要把留成比例划得合理，以后讨饭也不找省里！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周太和当过陈云的秘书多年，颇有工作经验。他说：“政治家不能不算账，专门算账的不是政治家。财政分成比例要根据过去，考虑现实，合情合理，要都过得去。”那位老领导一下子站起来说：“我就是个算账派，武汉财政困难，是企业效益不行嘛！”其实多数省领导是同情武汉财政困难的，主持会议的省委主要领导说，省、市再算算账，要都过得去才行！会后，我把会议讨论的情况整理了一下，送给吴官正，他看后写了几个字，让我送给王群（因他没参会，不了解情况）。我立即赶到位于武昌水果湖茶港的王群家中，进门后看见他躺着，头上敷着毛巾，我问了一句：“书记生病了？”他说高血压犯了，敷一下。他知道我是送材料，可能吴官正与他通过电话。他看完后就说：“存档，不要外传！”我揣摩王群的意思，他在维护那个老同志的形象，毕竟那个老领导是南下干部，是省里的主要领导之一。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应该是正常的，不应扩大分歧和影响。从这件事中我看到了王群与人为善的胸怀和厚道，背后从不议论人，也不谈别人的不足。后来听那个省领导的秘书讲，他在武汉市第六中学蹲点时曾流露出当年对武汉支持不够的态度。人的认识有时会经过时间的推移而到达新的彼岸。

对不同意见的处理，反映出了王群的胸怀和政治智慧。对有缺点或错误的干部，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防患于未然，立足于帮的办法，避免他们走得更远，以

致最后算总账，彰显了他的宽厚，对干部从不放任自流。在大量的新生力量走上领导岗位后，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有的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影响干部自己的形象。听到什么反映，他会及时地向干部本人打招呼，让其注意改正，防止出现“小洞不补，大洞尺五”的问题。当时有个青年干部，接受了别人的礼品，被人反映出来。王群知道后责成有关部门找这个干部谈话，退掉礼品，不占便宜，作出检讨，迅速改正。不让干部的缺点、错误累积和发展，使用、爱护、监管干部是领导的责任，是他非常注重的事。当时的干部队伍还是风清气正的。

鸟过留声，人过留名。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有效的工作时间更是有限。领导干部的形象和口碑是通过具体事件的处理逐步形成的，人生的轨迹总会打下烙印，迸发出生命的火花，折射出人格、形象、口碑，赢得人们心底的认同。往事并不如烟，那些闪亮的生命火花常常在人们记忆的余绪中回响。

（叶金生：武汉市政协原主席）

## 木兰生态旅游区的诞生

### ◇ 计 蕾

木兰生态旅游区的发展，从无到有，由点到片，由零到整，经芜致锦，在 20 年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2014 年 11 月，经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批准，黄陂木兰生态旅游区晋升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这标志着该地区旅游正式迈入 5A 时代，成功跻身中国旅游第一方阵。旅游业已成为木兰生态旅游区所在的黄陂区重要的支柱产业和兴农富民的重要产业。

近千平方公里的武汉大都市后花园——木兰生态旅游区成为了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生态旅游景区群，被誉为中部最美的生态文化休闲之都，被国家列为《中国 21 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项目中的优先项目，成为了华中地区及高铁游线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木兰生态旅游区先后荣获“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中国最美生态文化旅游名区”“中国十佳旅游区”“中国最具

活力的老区生态旅游区”“全国旅游系统先进集体”“湖北省旅游强区”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黄陂区以木兰文化为底蕴，充分利用清奇俊秀的生态环境，通过营造大环境、引入大投资发展木兰生态旅游区，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区向旅游强区、名区的蝶变，走出了一条发展全域旅游的具有区域特色的旅游兴区富民之路。

值此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特将木兰生态旅游区项目的由来和启动过程记录下来，作为献给党百年华诞的礼物。

### 项目的起因

1991 年，在武汉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筹备和举办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技术与产业结合国际研讨会工作期间，我认识了德高望重的国际咨询顾问——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 Honholdz 博士。1993 年，

Honholdz 博士寄来一封马来西亚农业部的邀请信，邀请武汉市对外友好协丁华副会长和我赴马来西亚参加农业旅游国际研讨会。会议期间，我们认识了来自各国的专家。

回国后，我们与市农业局和农委领导探讨开展农业旅游的可行性，他们推荐了黄陂县的夏家寺水库和鸟岛，新洲县的道观河和涨渡湖，洪山区的马鞍山林场，江夏区的汤逊湖、梁子湖和青龙山森林公园等 15 个点。

我首先考察了夏家寺水库和栖息着成千上万只白鹭的湖中岛，与时任黄陂县塔耳乡乡长兼党委书记陈贤良就发展农业旅游的可能性进行了交流。但由于 1993 至 1995 年期间，我调到市外资办工作，此事暂时被搁置起来。

1995 年，我回到武汉市对外友好协会并被任命为秘书长。恰逢其时，邀请我们去马来西亚参加农业旅游国际研讨会的马来西亚农业部官员与我联系，我就把在武汉发展农业旅游的设想与他们进行了交流。于是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来武汉进行交流考察。

当我把马来西亚农业代表团带到夏家寺水库和鸟岛的时候，眼前的一切让我惊呆了。在陈贤良书记的领导下，短短的两三年内，该地区旧貌换新颜，美丽的水库旁建了许多别墅群，湖里穿梭着载满游客的一艘艘游船，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看到此情此景，我们感到应该举办一个武汉市农业旅游国际研讨会，以提高农业旅游的规划设计水平和环境保护能力。为此，市对外友好协丁华副会长带着我向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和外国专家局申请立项，并邀请曾在马来西亚国际研讨会上认识的外国专家共 11 人来汉。我又在市旅游局卢处长的推荐下，去北京邀请北京大学和中科院地理所专家，并在湖北省、武汉市大专院校邀请

了十几位专家，筹备召开武汉市生态旅游国际研讨会（国内专家建议把“农业旅游”改成“生态旅游”）。

为了得到相关市领导的支持并邀请他们出席会议，会前，丁华副会长逐一向他们进行汇报。当向分管农业的副市长董绍简汇报时，董副市长仔细询问了召开国际研讨会的意义。丁副会长反复强调“为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一定要发展农业旅游”，并且耐心地讲述了发展生态旅游的意义和设想。令我们非常感动和敬佩的是，国际研讨会期间，工作虽然千头万绪，但董副市长不仅自始至终参加研讨会，陪同所有专家考察了所有的景点，而且每天晚上在会场召集中外专家进行讨论到半夜。

国际研讨会召开前，我们用一个月时间考察了 15 个点，并从中遴选出 5 个点，供会议专家考察。这 5 个考察点分别为：

1. 黄陂县的夏家寺水库—木兰山—研子镇大余湾的明清建筑群（我的同事雷清萍提议改名为“木兰湖—木兰山—木兰川”）；
2. 道观河；
3. 涨渡湖；
4. 马鞍山林场（我们提议改名为“马鞍山森林公园”）；
5. 东湖磨山。

1996 年 6 月 21 日，中国武汉生态旅游规划与发展国际咨询研讨会正式召开。时任市长赵宝江，副市长韩忠学、董绍简出席会议并分别在会上发言。

研讨会上，经过几番探讨研究，与会专家一致推荐以黄陂的木兰湖—木兰山—木兰川作为试点，进行全面规划设计。之所以定点此处，是因为这里不仅有山有水有古民居，而且还有历史悠久的木兰文化。

不久，国家计划委员会（现发改委）



1997年，计蕾（前排右三）与来武汉出席木兰生态旅游区整体规划国际研讨会的中外专家合影

和国家环保局联合发文征集国家 21 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项目，德国专家 Honholdz 博士来信告诉我此消息，我立即到武汉市计委确认了此事。接着，就把黄陂项目取名为“木兰生态旅游区”并不失时机开始准备资料，撰写项目介绍，不遗余力地推进，在市计委的大力支持下，终于抢在项目申报截止的前一天上报有关部门，使项目得以顺利入选。我之所以将该项目取名为“木兰生态旅游区”，是希望表达“木兰代表文化，生态代表自然”之意。

### 项目策划

当时我们市对外友协工作的分管副市长是韩忠学。我把所有与会的外国专家发来的项目建议全部翻译成中文，逐级上报给市领导。丁华副会长请求韩副市长邀请农业部门或旅游局牵头开展此项目，我们作为外事部门配合国际合作。

在几度协调农业部门和旅游局领导牵头均未果的情况下，韩副市长就安排帮助该项目列入《中国 21 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项目清单的市计委副主任乔江林牵头。韩副市长语重心长地说：“就请市计委和计蕾把这个项目进行下去吧。”说句心里话，如果没有

韩副市长的鼓励，我当时都产生了放弃此项目的想法。韩副市长后来一直很支持我们，多次开会协调。有了市计委牵头，项目终于启动了。

1996 至 1999 年期间，黄陂县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陆续出资 8 万元（放在市计委的账上）为国内专家支付现场考察费和规划设计费、《木兰生态旅游区总体规划》制作费、卫星勘测图纸费、总体规划翻译费、摄影家协会专家的摄影费以及后续再次召开的国际专题研讨会等费用。我们也竭尽所能陆续申请了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和外国专家局联合资助外国专家多次来汉的国际差旅费等经费。

1996 年春节前夕的腊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连续三天，国内专家集中考察了黄陂县的塔耳乡、研子镇、长轩岭镇、石门乡和木兰山。寒冬腊月里，专家们白天在当地各乡政府的陪同下跋山涉水辛苦考察，晚上住宿在木兰山上的旅馆里。旅馆里

只有夏天盖的薄被，每人盖两床也不顶事，只好合着棉衣裤睡了两晚。我回到家后，整个春节期间都高烧不退。

后续的几个里，在市计委的牵头和协调下，我克服重重困难，组织国内专家紧锣密鼓地写出了《木兰生态旅游区总体规划》初稿。每天晚上，我对规划初稿一字一句阅读并结合现场考察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改。接着，通过各种渠道多方了解，我找到了专门翻译《毛泽东选集》的著名翻译家，请他翻译十几万字的总体规划。拿到翻译稿后，我又逐字逐句地结合现场考察情况进行了修改。

在1997年举办的木兰生态旅游区整体规划国际研讨会上，国内外专家按照总体规划的景点到现场逐一进行考察，对《木兰生态旅游区总体规划》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建议把木兰生态旅游区划为东、西两大片：东片以木兰山、川、湖为旅游主体，进行线路策划；西片围绕日、月、星三大湖区进行策划。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个地区山多湖多土地少，农民因为长期没有足够的耕种土地陷于极度贫困，发展生态旅游是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悠久的木兰历史文化资源，变当地的劣势资源为优势资源的最好发展模式。

总体规划出炉后，德国专家 Honholdz 博士在1998年的市长国际专家研讨会上，特别提出实施此项目的方案。他说：“武汉两江三镇，九省通衢，正因为奇大，所以更需要有一个后花园，应该把黄陂的木兰生态旅游区建设成大武汉的后花园，让吃不饱饭的农民从保护生态和发展旅游中逐渐变得富裕起来。”

借此东风，我立即再次向市政府写报告，建议成立木兰生态旅游区管委会和木兰

生态旅游区开发总公司，请求由一位副市长任管委会主任。此后，胡国璋副市长被任命牵头此事。

如此一来，木兰生态旅游区的项目一时间被炒得火热，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后根据市里的安排，市旅游局、规划局接手后期工作。

就此，我们恪尽职守、竭尽所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很高兴为武汉市的整体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感动和反思

从1991到1999年，令我欣慰的是，在这9年时间里，外事工作的平台给了我机遇，使我有幸投身于木兰生态旅游区的总体策划工作，从亲历她从无到有、呱呱坠地，到亲眼见证她的逐渐兴盛和蓬勃发展。每每回忆起这段历程，不由得感慨万千。

在国家对外开放刚刚开始起步的时期，是市外办和友协的领导，给予我充分了解国外先进生态理念和环境保护经验的机会；是市政府有关领导和亲密的同事们，对我高度的信任和支持，才使得这个项目虽历经艰难曲折，但最终得以开展和顺利进行下去。

依照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发展观，可见当年木兰生态旅游区的策划极具前瞻性，而市政府决定发展这个项目，则实质性地带来了现在和将来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当然，以习总书记的“两山”发展观和脱贫攻坚战略来衡量、反观我们当时的工作，可以发现还有着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例如：侧重了水库、湖泊的利用，而对水源水库体系的保护考虑不够，木兰湖水体

一度遭受污染。所幸的是，黄陂县在改制成为黄陂区后，区政府做了一项非常精细的工作，就是为了保护木兰生态旅游区西片的三大水库的水源，没有依照总体规划去开发命名为日、月、星三大湖泊周边的项目。为此，由衷感谢黄陂区政府！

其次，对这个项目的整体发展如何带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策划得不够细致。虽然总体规划中提到利用荒山野岭发展茶油产业，因为茶油树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灌木植物，四季常绿，每年秋天开出白色花朵，来年结出碧绿的果实，非常适合绿化荒山且能带来很高的经济效益。而且，茶油是比橄榄油更好的食用油，是我们中国独一无二的农产品。但是，一旦个人承包了这些荒山野岭，他们更多考虑的是短期效益，不愿意投资发展这个需要7年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产业，使得木兰生态旅游区错失了成为中国茶油基地的机遇。

此外，值得反思的还有诸如按照总体规划如何控制好环境保护的问题。例如：原规划中提出木兰大道的建设应该保持道路两边的绿树成荫连着广袤的田园风光，可目前事实却是道路两侧被不断出现的楼房建筑煞了风景。另外，规划中对乡村山区和湖泊的垃圾分类处理和污水处理都提出了独特有效的方案，为此还申请了国家专利（发明专利公开号CN1256258A），但是在项目开发中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和管理。希望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并积极整改，使木兰生态旅游区持续健康发展。

使我非常感动和记忆犹新的，还有当年的黄陂县、乡两级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鼎力相助，为我们的策划工作提供了一切力所能及的保障。乡镇干部们朴实干练的品质，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铭记于我心中。

## 后记

德国专家 Honholdz 博士由德国政府援华资金支持，在黄陂连续工作了两年，进一步帮助项目的发展。

2001年，石门乡和长轩岭镇合并成长轩岭镇，时任镇党委书记陈克学率先领导开发了《木兰生态旅游区总体规划》中的木兰天池项目。该项目于2002年年初开发建设，只用了184天建成，2002年9月28日开园，打响了按照总体规划开发建设木兰生态旅游区项目的第一炮！从规划伊始，陈书记就一直是参与木兰生态旅游区设计建设的最积极的乡镇干部之一。

经过20年的发展，木兰生态旅游区已开园景区20余家，共建成A级景区16家，其中国家5A级旅游景区4家，国家4A级旅游景区5家，国家3A级旅游景区7家，是全国A级景区最密集的生态旅游区之一。木兰生态旅游区已打造成为充满汉味楚韵的立体符号，成为大武汉新的文化名片，成为讲好湖北故事的大美舞台。

即使现在，在黄陂举行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中，我常常被邀请出席并参加座谈。木兰生态旅游区的每一个新项目建成后，我都会去亲身体验，或受邀去参观。黄陂人记着我，我也时刻牵挂着黄陂木兰生态旅游区的发展。

（计蕾：中共武汉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原美大处处长）

## 父母对光未然的回忆

◇ 曾宪德

中山大道新开后，电视台刘军邀请我到老通城采访时，我专门请他绕道去一处位置。因为我母亲当时又再次证实了我父亲生前告诉过我的一件事：“黄石路（当年叫云樵路）路口对面，巷子口（汉安邨）高头两家，是‘通成饮食’的分店。”

她特别说道：“那年，光未然经常来这里，就在二楼你爸爸的床上睡午觉。”

母亲说的，是1938年保卫大武汉、武汉作为全国政治中心之际。

七七事变后，汉口最大的救亡歌咏组织“业余歌咏队”（次年升级为歌咏团，并派生出“三八女子歌咏队”）在地下党员王杰成和我父亲曾昭正等的筹备组织下建立。不久，父亲以他积极的行动和出众的歌喉成了武汉名人。当时经营“通成饮食”的祖父曾厚诚虽然心里支持我父亲的抗日行为，却又不免嫌他花钱有些手脚太大，“最会败家，不晓得家里的难处！”这是祖父常挂在嘴边

的话。即便是在这里开了个分店，名义上交给我父亲经营，实际上却将账目独立处理，免得正常经营受我父亲的干扰。

父亲的社会活动确实太多，加上“粉丝”成群，对家里干扰很大。为了避免干扰，后来父亲干脆很多时候就住在分店二楼，不回家。而光未然、冼星海等文化界挚友也需找地方躲避追捧，这里便成了他们经常来歇息的地方。

我听说后，这座小楼所在的地方就成了我心中的一块圣地。现从这里开始，写下我父母回忆光未然同志的几件往事。

### 书铺街的奇遇

1935年，父亲和光未然同志在“一二九”运动中就有过书面联系，我父亲最亲密的朋友、武汉大学中文系才子、后来成为我二姑父的李行夫，则与光未然有较多的交往。

当时父亲是武汉大学机械系民二七级的学生，是武大爱国歌咏活动的积极分子。

“一二九”运动后，由李厚生、万国瑞等领导的武大爱国学生组织成立了多达六七十人的歌咏队，成员多是武大抗日救亡活动的积极分子，每周五晚在理学院的阶梯教室，由父亲和二姑父等轮流教唱抗日爱国歌曲。

武大爱国歌咏运动高涨，引起了当时在学校势力雄厚的“蓝衣社”的极大敌视，父亲不止一次受到威胁和公开警告。但他爱国热血沸腾，全然不惧压制，与二姑父大力收集整理抗日救亡歌单，筹备编辑一本抗日救亡歌曲集。一个星期天，他与二姑曾竹瑛（当时就读武汉大学历史系）去汉口书铺街，想要落实一些与歌集出版有关的事。

书铺街路口有个金城文具店，店之一角即为汉口生活书店，专卖邹韬奋先生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书籍，爱国倾向十分明显。书店的经理顾一凡是父亲去上海时刘良模向他介绍的，父亲回汉后便常找顾一凡，渐与他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父亲与二姑走进书店，早就认识他们的店员便直接将他们带到了楼上。这楼上一大半是交通旅馆，文具店和书店各自仅占了一间房。顾一凡和两个陌生人正在书店的房间里谈话，见他们来，立即起身迎接，并热情地将他们介绍给了那两个人，随后指着其中一位介绍说：“这位是我的朋友张文光。”

父亲和二姑大喜，几乎是欢呼地争着说：“哎呀，张文光！是光未然先生啊！张光年，还有蓝枫，都是你吧？”

父亲兴奋地说：“去年声援北平‘一二九’后，我就很想能见你。今年你带拓荒剧团演出《五月花》，可惜我又没看成，第二次错过。但我的朋友李行夫认识你，也看过你们的剧，没想今天真有幸！”

光未然也有些激动：“李行夫？李豫章啊！我们认识很久了，是文友，还有书信往来。你们好多同学我也认识。你在学生中教唱爱国歌曲的事，我也听说过多次了。”

父亲说：“我在想，我们还应该走出校门，为更多的人教唱。现在我和豫章收集了不少抗日爱国歌曲，打算编辑一本能面向青年、工农大众和所有爱国同胞的抗日歌曲集。”

光未然很高兴：“这想法太好了，我支持！我们武汉是该多向上海文化界学习的。国难当头时，多些自己的作为，参加到国防音乐活动中去，无愧此生。你有什么要我参与，我会义不容辞。”

父亲说：“你作词的《五月的鲜花》，我很想收入，但是我手头的曲谱是传抄的，恐怕有误。有正谱吗？”光未然回答：“有，我这就给你。”他立即转身，熟悉地从墙边书架的一角抽出一本书，拿出了一张夹在书中的歌单，递给了我父亲。

父亲兴奋地捧起歌单，看到右上角有蝇头小楷：“作词光未然，作曲不详。”奇怪地问：“连你都不知道这首是谁谱的曲？”光未然摇头叹气道：“不知道，可我真想知道啊！”

父亲随后向顾一凡说出了来此的主要目的，顾一凡马上答应将会写信给上海教育书店的总经理贺礼逊，让他直接帮助父亲。

他们几个像早已认识的朋友一样，谈得十分投机，不知不觉就是两个多小时过去。临走前，父亲诚恳地说：“还有什么好的作品，请你们推荐。”

不久，因为话剧《阿银姑娘》的巨大影响，加之光未然积极的抗日活动，又在报纸上写文章支持“七君子”，招致当局的嫉恨，差点被抓。不得已，光未然仓促离开武汉到了上海。而几个月后，父亲被“蓝衣社”

扣上莫须有的“共党分子嫌疑”帽子，开除出武汉大学。一些同学因愤怒而退学抗议，其中有李行夫和曾竹瑛。当时父亲筹备武大同学自演《阿银姑娘》一事也因此流产。

### 光未然为《大家唱》作序

武大反动校方剥夺了我父亲的学籍（后来迁校入川前，又下令终止了李厚生等十多位爱国学生的学籍），但没能摧毁一个青年的报国意志。父亲没有沮丧、自怜和消沉，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用歌声唤起民众抗日的斗争。

父亲和姑父夜以继日地工作，编辑群众抗日救亡歌曲集《大家唱》。

七七事变后，一连串的大事相继发生：8月7日，日本在汉的主要企业日清轮船、泰安纱厂以及三井、三菱洋行、公大、松本、福田等全部停业，日本侨民和驻军全面撤离；13日，日寇悍然侵略上海；20日，日本飞机首次空袭武汉。在民族危难下空前团结的武汉人，听

闻我父亲在编辑抗日救亡歌曲集的消息后，纷纷主动帮助他。当时刚释放出狱的生活书店顾一凡经理，一有新歌单就主动通知我父亲，甚至送上门来。他又引见了上海教育书店的总经理贺礼逊先生，由其操办所有出版发行事务。

父亲回忆说：“光未然早就答应过我，他愿意为《大家唱》第一集写序。我就提前将目录寄给他了。”

我令人尊敬的光未然伯伯，在上海战火硝烟的日子里，还及时为《大家唱》写了序文，摘文如下：

近年来中国歌咏运动的盛大展开，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当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爆发的前夜，多年来被压抑，被损害的中国大众，内心的痛苦，需要一个发泄的机会。……他们（她们）需要用粗壮的喉咙来发泄自己山岳般的愤怒，需要用钢铁的歌声来表示自己战斗的热情。而这伟大的歌声又转过来提高了这种情绪，扩大了这种情绪，使群众战斗的心更加坚定而且英勇了。

……

……从救亡运动中产生了歌咏运动，这歌咏运动又转而掀动了救亡运动的高潮。

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出了目前的歌咏运动还有许多缺点：首先，诗人与作曲家还没有保持密切的联络，还不能适应



2017年，曾宪德（后排右九）与光未然次子张安东（后排右八）在武汉长春街小学合影

新的环境而有计划地供应一些新的歌曲来。其次，歌曲还不能充分大众化，歌调十九为大众所不能深切了解，过于复杂的旋律，也为他们所不能接受；作者还不能充分利用民歌体来制作一些通俗化的歌曲。最后，歌词与曲谱都有流于公式化的毛病，特别是歌词，有的简直空洞得太不成话。口号是无妨的，但既把口号织造在歌曲里面，一定要加一番艺术的处理。我相信毛病是由于作者对于救亡运动还缺少真诚的了解与热情，于是在制作歌曲的时候，便不得感觉词汇的枯竭了……

要克服以上的毛病，只有要求歌曲作者在实际的斗争生活中去学习……

朋友们聚集新近流行的救亡歌曲，编正成册，定名为《大家唱》，较过去坊间出售的歌集，都更为新颖合用……

光未然 一九三七·九·二五

### 抗战初期的重逢

1937年秋末，光未然流亡回到武汉。当时中山大道公新里巷道旁，是曾家的“大智旅馆”。旅馆通过公新里的过街楼连接到大智路1、3、5、7号的二、三楼，除1、3号的二楼外，均都改装为大智旅馆的房间。一腔抗日热情的父亲，在“一二九”运动时就将这里变成了爱国学生活动的重要秘密据点，被李锐等同学称为“抗日饭店”。抗战爆发后，父亲主动将很多流亡爱国人士免费安置在这里居住，其中包括冼星海所在的上海“救亡演剧二队”的大多数队员。由于曾家对爱国活动、流亡人士和伤病军人的慷慨相助，汉口社会和流亡人士口口相传，将父亲称作“小孟尝”。

大约10月下旬，光未然同志也来到了

这里，与父亲重逢。他组织了一个演剧队，经常到武汉周边的县城和乡下宣传抗日。他们的宣传活动非常辛苦，父亲也常和他们共同参加各种演出。那段时间两人接触密切，友谊日益深厚。彼此的称呼已变成“文光”“昭正”，前面说的云樵路路口的往事，也就发生在那时候。光未然和冼星海经常到那个分店碰面和休息。这一对中国音乐人和爱国文化人的黄金组合更密切地合作着，光未然作词的《拓荒歌》就是在这里经冼星海谱曲而问世的，我父亲随即在业余歌咏团进行了教唱演出：“……起来，起来，勇敢的拓荒队员……”

这年春节对流亡者的心灵打击是一番别样的残酷，更增加了他们对故乡和亲人的怀念以及流离的伤愁，也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抗日宣传热情。演剧二队和冼星海等50多人由军委会派车去了安陆，慰问从抗日战场上转来驻扎的中国士兵。

直到元宵节过去后几天，冼星海才回到武汉。次日，他就来到我家，给我祖父母带来了一些安陆的土产，还给我3岁的表兄带了玩具小龙。他兴致勃勃地对父亲说，在安陆遇到了也是下去宣传的光未然，并且受他的委托，一晚上就赶着谱写了两首歌曲。那是光未然作词的《新时代的歌手》和《戏剧抗战》。

前一首中唱到：

……我们新时代的歌手，  
有钢铁一般的拳头，  
打倒日寇、汉奸走狗  
争取土地、面包、自由……

后一首中唱到：

我们是青年的演剧队员，  
我们用戏剧从事宣传；  
舞台是我们的堡垒，

街头是我们的营盘。  
台上台下，打成一片；  
演员观众，一致抗战！  
……

然而大年过后，一连好多天，光未然都没有回到武汉。很快又是一个月过去，父亲和冼星海都有些担心：别出什么事吧。直到3月下旬，光未然才突然出现。他对父亲透露：他回老河口老家时，国民党县党部突然派人抄了他的家，将他的父亲抓走了，还差点抓到他。

父亲对我回忆时，自言自语般地说：“那时冼星海还不是共产党，可光未然好像已经是了。那个年头的顽固派还真是很猖狂很阴毒，不亲身经历的人是想象不到的。”据史料记载，光未然在192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保卫大武汉宣传周

据母亲回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汉口的办事处，就在今江汉路武汉关斜对面的一座楼房中。冼星海在那里对业余歌咏团和另外一些歌咏团体布置任务，还亲自到江汉路一家银行门口阶梯上，教他们唱光未然作词的《保卫东方的马德里》（有文将其记录为光未然作词的《保卫大武汉》）。如今，我97岁的老母亲，仍能不假思索地唱出经过80多年仍铭记在她心底的歌曲，她激动回忆唱起此歌的情景被央视记者录入纪录片《昙华林》中。

拿出你的力量，  
拿出你的金钱，  
加入正规军，坚持持久战，  
组成自卫军，发动游击战，  
大武汉，大武汉，

它是金城汤池，铜墙铁壁！  
它是中国的凡尔登，  
东方的马德里！  
……

光未然同志在武汉保卫战时期创作的歌词难以计数，据我所知还有冼星海作曲的《纪念五一节》《新中国》等，遗憾的是我没能力全部收集到，以上仅为部分。

### 发生在“舞台背后”的动人故事

1937年年底南京失守后，武汉市民和流亡同胞空前地团结起来。1938年，国民政府迁到武汉，武汉成为了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抗战中心。

为了进一步加强国共合作，促进全民族抗战“保卫大武汉”，经过国共两党协商，决定恢复北伐时期的政治部，国民党的陈诚任部长，我党周恩来同志任副部长，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设四个厅，其中第三厅由郭沫若任厅长，负责宣传，驻地设在昙华林。下设的第六处是艺术宣传处，田汉任处长。冼星海任三厅六处三科音乐工作室中校科员。不久，光未然也接到了到音乐科报到的通知（张光年同志实际上是驻三厅的共产党特别支部宣传委员，不过当时父亲并不知道）。

光未然与冼星海一同住在武昌昙华林第三厅后楼的一间寝室里。冼星海忙于歌咏活动，几乎每天都早出晚归，所以两人只能夜间交谈。每当有重要时事时，冼星海总是催促光未然当晚就写出歌词，然后自己连夜作曲，第二天出去教唱，有时两人也结伴同行。在朝夕相处的数月时间里，他俩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第三厅于1938年4月1日正式成立，

之后在它的领导下，保卫大武汉时期的全民宣传活动达到高潮，其中包括“六个周，六纪念，三祝捷，三追悼，单独九项，歌咏大会五次”。

“抗战宣传周”从4月7日开幕大会和文字宣传日开始。那天下午，正好传来了台儿庄大捷的喜讯。我祖父欢欣地买来两挂特大鞭炮，将其从“通成饮食”四楼屋顶一直挂到街面，让激动人心的喜庆爆竹声响彻了大智路口。之后“抗战宣传周”每天都有一个宣传主题。第二天是演讲宣传日，第三天是歌咏日，第四天是美术日，第五天是戏剧日，第六天为电影日，最后一天是三镇游行日。每天活动均在上午10点开始。

4月8日那天，汉口下起了雨，但是人们被台儿庄大捷激起的热情丝毫不受影响。全国各地在汉宣传团体近2000个、大约5万人走上了街头，在三镇的街道、市郊、医院及难民收容所进行演讲、宣传。而工人、店员、居民、路人、车夫、船夫或打着伞，或戴着斗笠，还有些披着蓑衣围上来认真听讲。

业余歌咏团也分成了十几个小组上街，每组都安排了队员，发表演说和宣读材料、领呼口号。当时我母亲章展仲是省一女中的学生，也是业余歌咏团里最小的队员，她在街头宣讲自己写的演讲稿，国语说得十分标准，语调也非常有鼓动力。光未然刚好带一支队伍来到那边，被吸引过去听了好一阵，并对父亲感慨道：“你们团真是人才济济啊！这个小姑娘要是培养演话剧，要不了两年，就要成名角。她叫什么名字？”父亲告诉了他。光未然不住地点头，这是他第一次关注到我母亲。

5月的一天，我父亲带着业余歌咏团、三八女子歌咏队参加在兰陵路光明大剧院

的演出。这天来了很多政府官员、各国外宾，还特别请来了很多军人代表，也向社会售票。那天在张瑞芳等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赵丹和叶露茜出场演唱《日落西山》和《一根哪，棒儿哪》后，下一个就应该是光未然演剧队的小话剧《沦亡以后》了。剧情讲的是一个农村姑娘被日寇强暴，她的心上人奋起投军抗日的故事。剧中的插曲由父亲的业余歌咏团在后台伴唱。

可正在那时，出演女主角的、颇有名气的上海流亡名演员突然向光未然索要出场费，否则拒绝出场。理由是明明对外卖了票，演员也是人，几角钱就打发了。第三厅的人一个月100多元大洋，光要她们饿着肚子爱国？冼星海、张曙等上前劝说也不起作用。光未然急得说不出话。节目即将上演，组织者慌忙中先安排了一个朗诵应付。

这时，父亲把光未然拉到一边：“文光，她今天这样子，怕就是演也演不好了，你看可不可以找人替一场。”光未然着急地说：“问过了，王莹有别的戏，别的队演过这角的人都有节目，就是顶，哪里能换得赢妆？”父亲把眼睛扫向自己的三八女子歌咏队，急中生智道：“莫急，我来给你找个替角。”忽然指着站在自己身边的人对光未然说：“就是她，她看过你们好几次演出了。怎么样？展仲，你上！”

我母亲当时只是一个未满15岁的小女生，不过个子已经很高了。

光未然马上同意，一边向她介绍演出要点，一边安排她去化妆。

《沦亡以后》开始了。随着女声们在后台用半声齐唱的民歌声响起，舞台灯光渐渐大亮起来。

好花也要蜂蝶儿采哟，

好树也要黄莺儿憩哟，

我的情郎呀，  
你为什么不到我这儿来哟。  
莫不是疯狗把你的脚儿伤，  
莫不是蝎子把你的脚儿坏，  
莫不是东洋鬼子把你的性命儿来加害哟，  
……

布景展现在观众面前：台中左边有一舍农房；远处，麦田青青；靠台后偏右的一棵大树下，有一块洗衣石，象征小溪就从那里流过。

我母亲端着小洗衣盆出场了，她初上台，却一点都没怯场，很自然地走到洗衣石旁，放下手中的小木盆，开始了几句说白。她的行走姿态和出色的京腔，顿时让剧场安静下来。光未然和冼星海竟同时往父亲背上一拍，说了声：“好，选对人了！”

母亲的说白倒是不错，演技也无师自通，男主角上场后与她的对白，展现了纯洁的农家女儿对幸福的憧憬，甜美而羞涩，分寸得体恰当。但是母亲不止一次回忆自己当时“出洋相”的事：“我从来没自己洗过衣服，当男主角退场后，我继续洗完衣服回到农舍前时，不知道怎么晾衣服，我吊起两个裤脚，不知该怎么往竹竿上放，台下有观众小声笑了起来。”

光未然急忙叫逃难的“乡亲们”涌上台，紧接着“鬼子”进村了，台下顿时止住了笑。后面的演出十分成功：“鬼子”肆意射杀着村民，并抓住了那“村姑”。“鬼子”的凶残让全场观众紧张而愤怒，大家在窒息中煎熬着，最后眼睁睁看着那“村姑”挣扎、哭喊着，被“鬼子”强行拖进农舍……

母亲转到了后台，连忙赶去换妆成遭受蹂躏后的样子。光未然先是说了一句“晾衣服这么简单的事都不会”，但又马上缓了口气嘱咐我父亲，不要去责怪小姑娘不会晾

裤子的事，随后对我母亲说：“展仲小姐，好极了，谢谢你！”

母亲换妆后再次登台，血泪的控诉激怒了全场观众。当演到她的心上人决心参军报仇时，后台的父亲与众人唱起了剧尾曲：

……哪一个男子心里没有意？

要打鬼子可就顾不了她！

随着男主角招着手缓缓离去，伴唱歌声由弱至强，撼动观众的心弦。歌声结束后，场中竟鸦雀无声。突然间，靠后排的军人中一个士兵爆发出雷鸣般的怒吼：“报仇啊，报仇！”剧场如同爆炸般，“报仇”“杀光鬼子”的吼声和口号声瞬时响成了一片。等到幕落，台下响起了超乎寻常的热烈掌声。

之后，母亲就进了光未然的演出队。她回忆说：“那时，由东北、华北、上海等地转移到武汉的青年团体、艺术团队是很多的。武汉的工人、店员、学生所组织的业余宣传队、歌咏队，更如雨后春笋。”

这之后直到1938年9月，光未然同志才在周恩来同志的安排下，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视察员的身份，随抗敌演剧队第三队离开了武汉。

（曾宪德：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广州广重集团技术顾问）

## 《长江日报》对 1950 年新中国成立后 首个春节的报道

◇ 朱建华

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而昨天的新闻已经成为历史。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进入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1950 年的春节，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的第一个春节。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的交汇点上，回看《长江日报》对 1950 年春节的报道，仍能深刻感受到人民对从旧社会到新中国当家作主之后生活变化的喜悦之情。

### 第一个人民自己的春节

1949 年 5 月 16 日，武汉解放。一周后，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报头的《长江日报》创刊，这是党在武汉这座大城市创办的第一张党委机关报。1950 年春节期间，《长江日

报》刊登了多篇读者盛赞新中国首个春节之变的报道和来稿。

作者金本富在《感谢与努力——春节小感》一文中写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武汉，人民翻了身，当家作了主人……”作者凌鹤在《新春小感》一文中写道：“在中南区，这是解放后第一个春节。这春节给广大群众带来了无比的欢欣，给翻身的人民有机会表现胜利的喜悦。”

从旧社会到新中国，人民对 1950 年春节的变化有着深刻的体会。张祖元是华中油脂公司的一名工人，他在《比一比》的来稿中详细讲述了这种变化：过去，到春节的时候，劳动一年，腰包还是空空的。今年（注：指 1950 年，下同）不同了，共产党来解放了我们，工资按价折实物计算，工会又办了

消费合作社……再也不愁吃、不愁穿了。

透过《长江日报》一张张泛黄的新闻纸，1950年的春节，武汉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这既体现在刊发的市民来稿中，也体现在记者采写的新闻报道中。

“往年过年就是过关。一到年关，工友们都提心吊胆，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干活，因此，就是借钱欠债也得送年礼。今年可就大不相同了，家家户户都腌有鱼、肉，不管好坏，有多有少，自己总有得吃的了。”这是2月19日（农历正月初三）刊发的《本市工人欢度春节到处呈现新的气象》一文中援引的粤汉路武东机厂工友杨定泉的讲述。在这篇报道中，还援引了海员工会副主任柴德巨的讲述：“从前过年，在年前便被迫送礼，并且还要给自己公司的科长、处长之类的人送礼，初一的一天，还要到他们家里去拜年，不然饭碗就保不住了。今年每一个弟兄都安心地过自己的年了！”

在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五）刊发的《两个不同的春节》报道中，记者还分别访问了出席过亚洲妇代会的工人代表郭巧英等人。郭巧英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从来没有过像今年这样的年。”她接着说：“往年过年，时常拿不到工资，去年年关发下钱来买不到两斗米，我们又不敢说话，忍气吞声，吃冷饭过年。今年我们都拿了一个月的奖金和折实工资。我买了四份公债后，还买了三斗米、四担柴、一斗糯米、十斤猪肉，又给孩子做了四件新衣服、买了新套鞋，我自己也做了四件新衣服。”

### “睁开眼睛看远处这才对呢”

从旧社会到新中国的变化，感受深刻的并不局限于一般的市民和读者。中国共产

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的李达，在通过《长江日报》发表的春节讲话中说：“1950年的春节，是中国三亿六千万以上农民胜利的春节，是中国农民有史以来第一个快乐的春节。”

2月17日是农历正月初一，这天的《长江日报》还同时刊发了张难先和黄琪翔的题字。张难先为这年春节写了一幅标语：“咬紧牙关苦两年那就好了，睁开眼睛看远处这才对呢。”黄琪翔写的是：“人民的力量已经创造出千百年来未曾有过的新中国，为着爱护它，保养它，我们应有牺牲一切个人权益的认识和决心。”

张难先是民主革命家、爱国进步人士，历经清末、民国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黄琪翔是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

两位社会贤达通过在媒体上刊发题字的方式公开表态，既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变化的盛赞，也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

“今年的春节，从全国范围来说，还算是第一个人民自己的春节……今年的春节，可真称得起‘普天同庆’了。”作者李蕤在《春节别关住门过》一文中呼吁：“一定要去慰劳我们的军队，慰问我们的烈属和军属。”

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党和政府没有忘记解放军。2月19日晚，武汉市人民政府在市府大礼堂举行春节联欢会，演出游艺节目，招待本市军、工、烈属。同一天晚上，武汉市总工会筹委会为进一步密切联系部队和工人，共同搞好1950年武汉市的生产建设，还举办了春节军工联欢晚会。

2月17日的《长江日报》还专门刊登

了一幅题为《请解放军同志喝翻身酒》的漫画，体现了军民之间的深情厚谊。漫画背景中张贴的“不愁吃穿”“努力生产”条幅这一细节刻画，展现了1950年人民的第一个春节的喜庆景象。

部队会怎么过年呢？林之右的来稿中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打算：春节晚上，警卫汉阳解放砖瓦厂的某部二连，请砖瓦厂的工人同志联欢，战士们自己编排了一些快板和几个短剧，节后的几日，组成秧歌队向房东及军、工、烈属拜年。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也有人仍在岗位上坚持工作。2月20日刊发的《坚持工作庆祝春节》报道的就是这方面的情况：“抢修戴家山三号桥二野工兵团战士、湖北省邮局转运股及邮件股职工，自动发起

春节不休息，坚持工作。充分表现出他们对人民建设事业的热情。”武汉市轮渡管理处、公共汽车管理处全体职工都以继续工作的实际行动来庆贺春节，保证春节期间市内交通运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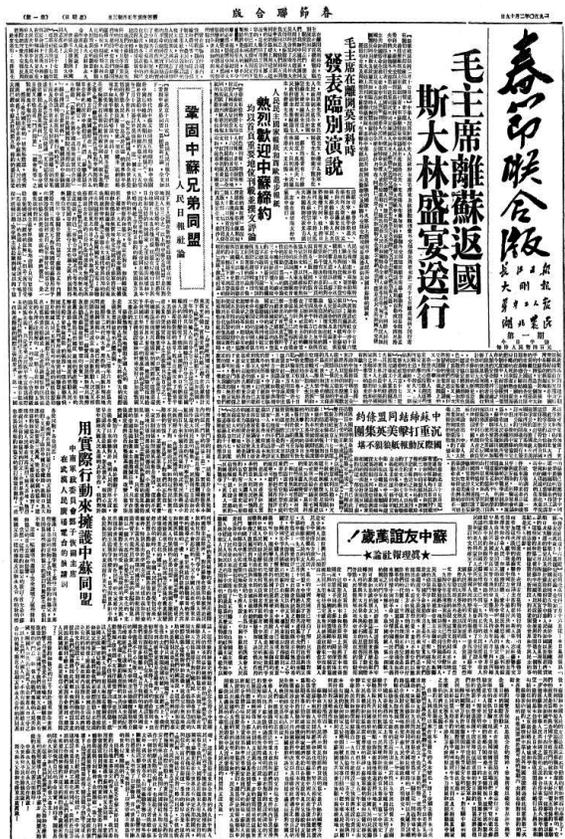
#### 四报携手出版“春节联合版”

现在的《人民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报，是全年不休刊的，一年365天每天都要坚持出报，工作日与节假日的区别只在于版面数量的多少。

1950年2月17日，《长江日报》刊发了一则《联合启事》：遵照新闻总署关于春节报纸休假办法的精神，决定18日无报，19日、20日及21日出联合版（各报订户照旧寄送），22日各报照常出刊。《联合启事》刊发在《长江日报》头版报头最左侧的醒目位置，落款是《长江日报》《大刚报》《华中工人报》《湖北农民》。当时，这四家报纸的出版地虽然都在武汉，但性质、定位并不相同。

《长江日报》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覆盖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和武汉、广州二市。《大刚报》是武汉解放后唯一被允许继续出版的民营报纸。1949年6月1日创刊的《华中工人报》，定位于“工人兄弟们自己的报纸”。1949年8月5日起发行的《湖北农民》，定位是面向湖北农村。

1950年的春节，《长江日报》等在农历正月初二休刊过一天后，连续三天推出了《长江日报》等四报联合的“春节联合版”。“春节联合版”为对开两个版。李达的春节讲话就刊发在“春节联合版”上。



1950年2月19日，《长江日报》等四报联合出版的“春节联合版”第一期头版

编排方面，“春节联合版”的书法体报头打破了《长江日报》创刊后报头居中的惯例，选择了竖排居右的方式编排。四家报纸的报头则横排居于“春节联合版”报头之下，并注明是联合版第几期。

内容方面，“春节联合版”的稿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内主要的时政新闻，以新华社稿件为主，主要刊发在一版；一类是本地的新闻，以本地供稿为主，主要刊发在二版。本地稿件的消息头不一，具体有“本报讯”“本市讯”“武昌讯”“河南讯”“湖北讯”“本报江西讯”等。

“春节联合版”三天的头条消息分别为《毛主席离苏返国 斯大林盛宴送行》《全国各地人民欢欣万状 热烈庆祝中苏缔约》《世界各国劳动人民及进步报纸 热烈欢呼中苏同盟》，均出自新华社。

连续三天的“春节联合版”上都有广告。广告每次均在二版刊发，每天规模不到版面的三分之一。广告内容类型多样，既有诸如“中国人民银行汉口分行公告”“鄂南电力公司自行设立武昌收费处通告”等的公告、通告，也有中国医科大学等高校的“联合招生简章”，还有“王肇基化痰汁”“飞马抽水皂”等商业广告以及文艺演出信息。此外，还刊登有寻人等信息。

1950年之前，在我国也曾出现过报纸的联合版，如1938年5月到8月，《新华日报》《大公报》等参与的“重庆各报出联合版”，反映了当时重庆新闻界的联合和斗争。1950年之后，包括武汉在内的一些城市在春节、五一、国庆假期时，媒体也曾联动出过联合版，但1950年的“春节联合版”是最与众不同的一次联合版。

之所以说1950年的“春节联合版”最与众不同，一是系四家媒体的联合，而且是

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联合，后来《长江日报》与《湖北日报》、《湖北日报》与《武汉晚报》也曾多次出过联合版，但参与媒体不及这次多；二是这是同城四家不同性质、不同定位的媒体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联合出报，具有重要意义；三是这次的联合版报头设计比较特别，与后期的一些联合版突出各报报头不同，这次突出的是“春节联合版”的报头。

转眼间，距离1950年春节已经过去了70多年，当年一起参与出版联合版的四家媒体，有的早已停刊，有的改名了，有的今天仍在出刊。其中，《大刚报》后被改造成武汉市委机关报《新武汉报》，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1952年年底终刊后，《新武汉报》于1953年1月1日起改名为《长江日报》继续出刊。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旖旎风光秀。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相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进一步显著提高。

（朱建华：长江日报报业集团长江财经传媒研究院主编）

## 百子巷，岁月如稠情如故

◇ 王琼辉

### (一)

汉口后花楼街曾有一条东西向的小巷叫百子巷，“文革”中改名叫“革新巷”，是我家生活 20 多年的地方。

“百子”一词来源于《诗经·大雅·思齐》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意思是西周文王的妃子太姒生十子，众妾则宜生百子也。其实，百子巷的取名还是直接来源于巷子里曾经有一座小庵堂，叫百子庵，位置在百子巷中段往居巷的拐弯处。

百子庵不大，我小时候到花楼街小学上学每天都要经过，看到里面没几个比丘尼。听先父讲，别看庵堂小，以前香火特别好，里面供奉的是送子观音的泥塑像，前来烧香

拜观音的人大多是为了祈求得子，据说还十分灵验，使得我家隔壁楼下一位姓徐的下江人开了一家香蜡铺，常年生意也跟着好。

大约是在 1911 年，武昌首义，清军前来镇压，汉口惨遭大火，花楼街及这条巷子也被烧得残缺不堪，一个叫竹慧的比丘尼在此建小庵堂。没过几年，20 世纪一二十年代，由于后花楼街独特的商业位置，带动了一阵房地产开发热，有位江西药材商人杜建清，也来汉口做买卖。江西人迷信双陆数字，生意人家摆列的瓷器品就有两个鹿头的形状，“鹿”与“禄”同音，寓意吉祥，杜建清就先用两个“陆佰元”起家做生意。老话说：“货到汉口活”，杜老板经营药材赚了大钱。得意洋洋之时，就花钱在百子巷的西头尾部朝北处建了双陆里，朝南处建了德元里及这

两个里分两旁的6间两层房屋。两旁的6间房屋挨得很近。杜老板自己住的是双陆里，寓意他起步做生意是靠两个“陆佰元”而成的，斜对面的德元里，既指喜得元宝，又是指做生意要品德第一。双陆里口曾有一座从江西运来的粗大木材做的两扇高大栅栏门，过去曾有人把守，1958年大办钢铁时拆了当木材炼街道小高炉去了。

杜建清在百子巷投资房地产，除了考虑到这里是黄金宝地，做生意方便，闹中取静，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我家楼下曾住过姓童的一家人，老婆婆叫陈凤梅，活了90多岁，于2006年去世。她是1929年嫁到童家的，开始没有生育，年轻时多次到百子庵拜过观音菩萨，后来一口气生了七个儿子。陈婆婆告诉我，那位比丘尼会号脉，有时还为施主开点药方，有些多年不育的夫妇也可得到其指点。陈婆婆在巷子里住的时间最长，对百子庵的事知道不少，我曾经听她讲起那段令人唏嘘的往事。

杜建清与百子庵的竹慧都是江西樟树人。樟树这个地方过去被称为“药材之乡”，也有“八省通衢”之称，樟树的药材在全国闻名。竹慧是商户人家出身，她父亲在樟树街上开生药铺，人缘好，头脑活，善于批量经营，生意蛮兴隆。在父亲的管束熏陶下，端庄秀丽的竹慧知书达理并略懂中医。小姑娘长大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前来提亲的人踏破门槛。姑娘心目中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在店里帮父亲打点生意的小伙子杜建清。杜家家境贫寒，上有双亲下有弟妹，靠他勤扒苦做，养家糊口。虽然知道姑娘有爱慕之意，自己也喜欢对方，但自觉门不当户不对，不敢奢望。姑娘的父亲有个好友在湖北蕲州，也是做药材生意的，父亲最终答应把她许配到那里，认

为知根知底，又是同行，将来生意上彼此都有关照，女儿过去也可做个帮手。迎亲的时刻到了，从樟树到蕲州有陆路也有水路，父亲说陆路不安全，就选择水路走鄱阳湖进长江。越是怕鬼越出鬼，在鄱阳湖口，还真遇到一伙歹徒，钱财被抢，新郎被杀，姑娘因被奸污而悲愤难当、羞愧难忍，就在临近长江的地方投江自尽了。

一位好心商人运货去汉口的小船经过那里，叫人救起了姑娘，她已经昏迷不醒，几天未进食，等她醒来，哭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那位商人把她带到汉口，经人再三好心相劝，她仍感到万念俱灰，无脸回家见人，在汉口能干什么呢？不如削发为尼，进庵堂度过余生。起初，她在六渡桥一带的庵堂吃斋念佛，取名竹慧，之后就来到百子庵。

时间似流水，十几年一晃就过去了，当杜建清离开老家来武汉做生意，赚了钱建了房，万万没想到在破旧矮小的百子庵拜观音时，无意间见到了竹慧，竹慧死不相认，早已情断意绝。再说杜老板已有妻室儿女，两人只能是无缘无分了。不过，杜老板还是念及过去的情意，出钱修缮了百子庵，修好了百子巷的青石板路，好让更多的百姓前来烧香求子保平安……

## （二）

寒暑交替，平淡而过。百子巷的人依旧买菜做饭，生儿育女，两边各有6户人家，依然还是早晨下排门，傍晚上排门，忙着那小本生意。说起百子巷这双陆人家，每一栋楼上楼下两层，房子内空高，砖木结构，冬暖夏凉。楼上住人，楼下做生意为主，从我家楼下算起，朝北有童家的柴火铺、徐家的香蜡铺、芳芳家的小染坊，隔一个德元里，

再是肉铺、鱼行、切面店；朝南有杂货铺、李家的裁缝铺、梁家的小诊所，再隔一个双陆里，还有吴家的炭圆铺、彭家的小酒馆、土产店。如果加上巷子口的鸡鸭行、糕点铺、租书摊、剃头铺，这里俨然像一个小市井，不出小巷就生活所需样样俱全。

我家就住在100号，即在柴火铺的楼上，与楼下小诊所（95号）相对。诊所的主人叫梁奕，高高的个子，瘦长的脸，鹰钩鼻子，我们小孩子们背后说他像德国鬼子。听大人们说，梁医生以前确实是在德国学的医，而以眼科最为擅长。他的老伴也是一名医生，



革新巷即原来的百子巷（2007年摄）

在武昌一纱医务室当厂医。下班回家除了忙家务，再就是给梁医生打下手，做手术的辅助之事。梁医生医德高尚，结人缘，百子巷里的人有个三病两痛，哪怕半夜三更找他，他都二话不说，要么出诊要么及时救治，有时不收钱或者收得少。我家曾外祖母患白内障，就是梁医生治好的。

百子巷家家户户的小孩子特多，梁家也一样，五女三男，多子多福。梁家与众不同，家境宽裕，别看平日里清闲，可做个把眼科手术，还是挺赚钱的。梁医生还喜爱京剧，悠闲时邀上戏迷朋友，拉拉京胡放开嗓

子唱唱。梁医生爱唱京剧里的红生戏，也就是关公戏，像什么《华容道》《战长沙》里的唱腔他都唱得有板有眼，很有点英雄气。梁医生也自己教或者请人教他的儿子姑娘学唱京戏，每次他们家唱戏，我们这些小孩子们都在门口围着看。就是在这种艺术氛围中，梁医生把二姑娘梁国英培养出来了。梁国英身段好，扮相漂亮，嗓音甜美，于1959年考上中央戏曲学校，学旦角，与京剧《红灯记》里李铁梅的演员刘长瑜是同班同学。记得那时放暑假，梁国英从北京回来，总要带一些小人书给百子巷里的小孩子们看。中央戏校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云南京剧团工作，算是我们百子巷出的一位社会名人吧！

我家隔壁（98号）是一个香蜡铺，老板是浙江人，叫徐宁，脚有点残疾。一楼是一个丁字形柜台，一个走道的墙壁做成木制格子，放一些香蜡制品。有喜寿用的大红蜡烛，白事用的大白蜡烛、点的各种香，焚烧

的黄表纸、纸钱，黄、白锡纸做出的“金银元宝”，丧主院门前挂的挑丧纸，还有“门神”“财神”“灶王爷”等各种木刻画、纸码等。

徐老板经营头脑灵活，还兼营普通低廉的化妆用品，如胭脂、扑粉、桂花梳头油、香碱、球形香皂等，老远就能闻到从香蜡铺里飘出来的香味。

听老人们说，香蜡铺是杜建清让徐老板开设的，方便人们去百子庵堂求仙拜观音。

徐老板有个远房侄儿，耳朵有点背，脚有点瘸，在香蜡铺当学徒，人不太灵光，常把活做错了，惹得老板打骂不断，在20世纪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时得病去世了。从此，铺子里的活由徐老板一人干。

别以为这里生意一般，看起来购买的人不多，但遇到别人家办红白喜事等，批量就蛮大。每逢春节，香蜡铺的生意就特别好，这里卖鞭炮烟花，一楼后房做仓库，年前购进的货，正月十五前常常就卖完了。

他们家小伢也多，老板娘却在居委会当小组长，平日忙于检查炉灶火星、清洁卫生、调节邻里纠纷等。1966年4月，徐老板把香蜡铺关闭了。

### (三)

我家斜对面(97号)一楼住着黄陂人李发财，他是百子巷小有名气的裁缝，那时才40多岁，头发长得较上，方正脸，待人和气，老婆去世后留给他二男一女。他从事这个行业已经20多个年头，每天的生活就从这间十多平米的小店铺里开始。他是个乐天派，只要开了店铺门，收音机就会传来楚剧唱腔的声音，他干活时，嘴里还时常哼着楚剧调子。小店铺干净整洁，里面整齐摆放

着各种布料，完工的服装挂在房间上方，简单的布置下，台板上陈旧的剪刀、量尺等裁剪所需的工具，都与他朝夕相伴了多年。在裁缝行业最鼎盛的时期，掌握了这门手艺，就意味着能够吃上一口轻松饭，光靠这手上和眼上的功夫，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俗话说：“好酒不怕巷子深”，他年轻时从黄陂过来，曾两次拜师学艺，在百子巷里开起了自己的裁缝铺。凭着精湛的手艺，当时吸引了远近不少女顾客。从布料变成衣服，要经过量身、裁剪、熨烫等近十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不能马虎。想要做出合身又得体的衣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活计。在没有缝纫机的年代，一块布料要做成衣服，靠的是缝纫师傅的一针一线。后来缝纫机出现，虽然节约了一些人力，但精工出细活这一要领却从未改变过。

李师傅有个绝活，善于做旗袍。以前的旗袍，元宝领子高大，服体肥宽，卡腰很小，下摆又很大，大襟开到底。妇女穿起来既不随体，又不舒服。经过李师傅多次试裁改制，改成小领子，卡腰大、随体，上边套头，下边小开襟，式样新颖，穿着舒服，受到妇女们的欢迎，前来找他做旗袍的妇女还真不少。据说附近笃安里5号有一位姓魏的少女，因裁剪服装认识李裁缝，多次接触，两人逐渐产生感情，但女方父母坚决反对，说是年龄相差太大，使得这段婚姻没有办成。

李师傅还有一种服务项目——翻新。穿旧的衣服对一般人而言，扔掉可惜，可是怎么穿还是件旧衣服。李师傅适时地推出了以旧翻新业务。料子好些的旧衣服经过改造，不但长短宽窄与原件几乎一模一样，而且完全是改旧如新，美不胜收！翻新之后，原衣的反面成了正面，只要别人不是凑近看，是决计看不出一丝破绽的，只是钮扣洞

变换了方向，原洞织补得天衣无缝，上面又缝了钮扣，根本不见原来的痕迹了，活脱脱又是一件新装！

在百子巷德元里口（96号），曾有一家姓戴的人开的染坊。染坊店面不大，显不出什么气派，像普通的小户人家，但比别家多了一种臭碱的气味，很不好闻。染布的时候味更大，一条小巷子的空气都被他家熏着。染坊里收一些白布，有手工织的白粗土布，也有机器织的白洋布。白粗土布幅窄、面宽，上面分布着不均匀的小小线疙瘩。

染坊里的染匠就是戴师傅，他接手的布，用手在台面上量，会一口说出准确的尺寸长度，那木制的台面上有刻度。再与顾客约定，下一周某一天就可以来拿了。所要的老蓝、毛蓝、印花或不印花的，戴师傅都记在心里，布上也做了记号。

染坊的染作时间，大多在清晨。德元里里分口摆有染缸，缸里冒热气，白布在滚水中换了颜色。戴师傅手上带有黑色皮套，那布绞出水后，晾在里分口一侧搭好的木杆上。这些染布在阳光下随风飘荡，小伢们往这里走或玩，都不敢碰，怕沾上未干的色彩。

说来也怪，当软中略硬的新布蹭到我的脸上，那气味就变得十分好闻，有一股沁心的异香。戴师傅笑咪咪地卸下这些染布时，折叠得非常整齐，只等顾客来时交到其手上。然后，有的顾客再把这些染布送到前面不远的李发财裁缝铺，不久染布就会变成顾客的新衣服了。我至今回忆起来，那个时候，无论生活多么没有色彩，最普通的人群也会用他们的智慧让黯淡的日子光亮起来。

生活在不知不觉里改变，戴师傅也老了，做不动了，后来染坊就消失了，这一手艺也失传了。因为依靠这一行已经不能养家糊口了。但是，昔日染坊的味道，依然在我

记忆里清晰如昨，老街坊之间互相帮衬和关照的情感也使我难忘。

#### （四）

我家（100号）楼下童家就是卖木炭和碎劈柴的柴火店。听他们家讲，以前开的是米店，解放后粮食属于国家统购统销，米店逐渐失去市场，所以改了经营项目。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时，童家的老爷爷还健在，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他批发购回木炭和柴火，柴火还是比较粗而短的原树料，他抡起斧头顺着纹路砍开，砍断成一尺或两尺长，然后在堂屋架成“口”字形，可以风干木柴的湿度。

有些木柴还是果树杆或兜子，卖烤鸭烤鸡的、做食品生意的还经常前来购买，据说那样烤出的鸡鸭肉食等有果树香味呢！过去，一般人家都烧煤炉子做饭、取暖。讲究一点的人家在冬天来临前，备有木架子的炭盆或陶器盆缸，还有的人家有涮羊肉的紫铜火锅，这都需要准备黑黑的木炭。一到秋凉，童家卖木炭的生意就来了。在一楼堂屋放着盛有木炭的荆条编的筐，或是竹篓、麻袋。有时还捎带着卖碎劈柴。碎劈柴是在生煤炉子时用来引火的小块劈柴，是烧木炭剩下的下脚料，这些一年四季都好卖。

我家斜对面双陆里旁边（93号）就有吴家开的炭圆铺，为夫妻店，前面住家带营业，后面生产煤球。

他们做炭时也要看成色加黄泥巴，一般掺和5%到10%不等，必须恰到好处：掺多了，炭不好烧，顾客骂人，影响生意；掺少了，缺粘性，煤不成型，也亏本。往往丈夫做煤球、送煤球，妻子守店卖炭，毛利赚50%。居民买煤，只需到炭圆铺叫一声，即

可按时送到家里，蛮方便快捷。那送炭的人挑副担子，上别人家楼上时，前面绳子系短，动作十分溜刷，往你家炭篓子一倒就完事。如果卖给需要量大的大户，都会给烧煤师傅送小费，一般按销售价的10%给，叫烧煤钱，以此笼络用户。

炭圆铺常常借里分口的一半地方把原煤做成筛摇煤球，工具有像铲子一样的大平锹、小簸箕似的大铁锹、荆条编的大圆筛子和小花盆。摇煤球是一种既需要体力又需要技术的活。首先是把煤末子和黄泥巴按大概的比例混合好，用水和好，要软硬适度。要把摊放煤坨坨的地方扫干净，薄薄地撒一层筛好的细煤末，用大铁锹把和好的煤坨坨铲过来，摊成约1寸厚抹平，边沿成约45°的小坡面，上面再撒上一层筛好的细煤末，用大平锹在上面切出横平竖直，长、宽均约1寸的小块，成为小煤坨。再用大铁锹分批把小煤坨铲到底部支着小花盆的筛子里，摇煤球的人蹲下身双臂用力摇动筛子，使筛子以小花盆当轴在地上上下左右旋转，小煤坨在筛子里来回翻滚成球形，倒在扫干净的地方摊开即可。小煤球经过日晒风吹干至能烧就可以收起来备用了。

筛摇比手捏劳动效率高，但摇煤球这活又脏又累。说其脏，是在整个制作中浑身都是煤灰，要是擦鼻涕，鼻窝处一定会留下黑手印子。因而，做煤球的人穿的衣裤鞋袜都是深色的，还系着鞋罩，不然煤末子能跑到鞋里了。说其累，是摇动时要蹲着，而且全身的重量和筛子的自重、筛子里煤球的重量全由踮起来的两只前脚掌承担。摇动时只有用前脚掌着地才能使得出劲来。摇煤球的人只有摇好一筛子煤球才能借着起身倒煤球之际喘息片刻。



德元里（2009年摄）

为了养家糊口，吴师傅和老伴，加上大儿子帮忙，累点脏点不算什么。

### （五）

在我们百子巷，最早开门的是94号的肉铺，最晚关门的是做夜宵的小酒馆。

一大清早，猪肉早早运来，都是半片屠宰好的整猪，肉铺的刘师傅就得把猪肉各部位解剖，排骨、脊骨、猪脚、蹄髈剔出来，板油、花油掏出来，还有猪肝、猪腰子、猪肠子等清理出来。解剖好的猪肉就用铁钩子钩住挂在肉案子上的横架子上，再装上电灯照着，有个好卖相。

卖肉这一行，一不怕油腻，二不怕腥气，三要有力气。半片猪肉大块五六十斤，中块二三十斤，无论挂在架子上，还是放在案板上，割肉时搬来搬去，没力气干不了这一行。割肉离不开刀斧，一把斧头五六斤，割肉的厚刀也有三四斤，手起刀落，白花花的猪肉很快被人买走，生意好时，一早上要挥刀斧几十上百次，累得腰酸背痛，一方案板刀痕交错，够卖肉师傅辛苦的了。

对于一般顾客，他们只是瞟一眼，接过肉票和钱，一刀下去，又准又狠。这准既体现在重量上，又体现在质量上，肥瘦搭配，骨头与肉也搭配。过去人们买肉总希望买到排骨，但那却是个稀罕物，得起三更睡半夜去排队，有的人搞个笊箕、砖头什么的占位置，想抢在前头买到排骨，有时还扯皮打架。那刘师傅就有小特权，可以暗自留存一些排骨或好部位的猪肉，照顾熟人和关系户。至于猪下水，价钱不贵而且不要肉票；猪肝、大肠、猪腰子是高级滋补品，凭医院证明可以买一副，其他人想买必须有关系，走后门。当然，刘师傅对巷子里的街坊邻居还是笑脸相迎，肉也割得好些。

肉铺斜对面的小酒馆（91号）则不同，总是下午开始营业，一直到深夜。里面一个小柜台，柜架上摆好各种白酒、黄酒，室内摆着几张小桌，卖自家做好的一些凉菜，如油炸花生米、卤藕、卤干子、卤海带丝、卤鸡、卤鸭、卤牛肉等，香飘小巷子，风味也独特。小酒馆的女主人姓罗，与肉铺刘师傅的关系很热乎，尽管肉的供应有点紧张，但从那里总可以搞到一些肉食，所以晚上做的肉丝面十分俏销。我们巷子离长江边近，也住有一些码头上扛活的人，还有跑船的海员，以及巷子里做小生意的人，他们喜欢在小酒馆坐坐，喝着小酒，解解乏，

天南海北地神聊，晕乎乎回去进被窝睡一觉，明天又是一天。

太阳从巷子东头升起，又在巷子西头落下，青石板路迎春送秋，烟火气的小巷子，五味杂陈，有白铁匠的敲打声，有染坊散出的难闻气味，有炭圆铺的煤灰渣，有香蜡铺的烟熏味，有小酒馆的卤菜味，还有孩子们的疯闹声……这就是小市民的生活，人们之间都相安无事，相互包容，做个小生意糊口，也不容易。大家也相互帮衬，孩子们放学回来，吃不上饭，到邻居家去蹭饭是经常的事。找这家要点米汤浆被单，问那家有没有酱醋救个急，你家即我家，出入蛮方便，日子过得苦也好，累也好，一家人和睦在一起最好，百子巷，岁月如稠情如故。

如今，后花楼街与百子巷因老城区改造被拆迁了，昔日的街巷荡然无存，但生活如同一把烙铁，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头脑里留下深深的烙印，那些或甜或酸或苦或辣的往事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新的生活又开始了，新的故事又将继续……

（王琼辉：武汉市商业学校原政教处主任）

## 黄鹤楼轶闻

◇ 夏新民

### 一联两楼

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公元 223 年）的江南三大名楼之一黄鹤楼，近 1800 年以来屡次遭受战火焚毁，屡毁屡建。无数骚客赋家、文臣武将，到此登高望远、抚今思昔，留下不少千古名句。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崔颢的那一首《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后人评论此诗：“意得象先，神行语外。”

以致李白读到这首诗，曾感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其实李白何尝有景不道呢？他题过的黄鹤楼诗，至少有十首之多，那首《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

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更是 1000 多年以来，妇孺皆知的千古名篇了。

其实自古以来，名楼与名联，须臾不可分离。文以楼存，楼以文名。而“山踞龟蛇，渊临鹦鹉，巍然耸立”之江南名楼黄鹤楼，佳联迭出，更是不足为奇。

同治进士李联芳题黄鹤楼联，就将上面唐代诗坛崔颢、李白逸事，上古传说，眼前胜景，胸中风雷，一并写于其黄鹤楼联中，联云：

数千年胜迹，旷世传来，看凤凰孤岛、  
鹦鹉芳洲、黄鹤渔矶、晴川杰阁，好个春花  
秋月，只落得剩水残山！极目古今愁，是何  
时崔颢题诗，青莲搁笔？

一万里长江，几人淘尽？望汉口夕阳、  
洞庭远涨、潇湘夜雨、云梦朝霞，许多酒兴  
风情，仅留下苍烟晚照！放怀天地窄，都付  
与笛声缥缈，鹤影蹁跹。

晚清进士吴獬，也有一联题黄鹤楼，

离题虽远，却抒发内心，拿崔李说事，顺便涉及官胡二人，联曰：

有所愁便写，无可道便罢休，君若问神仙，试想想崔李本事；

一自下故深，百能容故博大，我来望江汉，长殷殷官胡替人。

此联中的官指湖广总督官文；胡即胡林翼，中兴名臣，湘军崛起的栋梁，最为曾国藩倚重。胡林翼也有一联：

黄鹤飞去且飞去；白云可留不可留。

胡林翼在儿童时代，即被近代湖湘经世领军人物陶澍一眼看中。之后入赘陶府，曾风流成性，蹉跎岁月。陶有耐性等待。再后，胡幡然悔悟，成就一番事业。其事业的顶峰，正是其湖北巡抚任上，这也是黄鹤楼下的一段佳话。

同为曾国藩倚重的中兴名臣彭玉麟，也曾几次题联黄鹤楼。其一：

我从千里而来，看江上梅花，直开到红羊劫后；

谁云一去不返？听楼中玉笛，又唤回黄鹤飞高。

其二：

心远天地宽，把酒凭栏，听玉笛梅花，此时落否？

我辞江汉去，推窗寄概，问仙人黄鹤，何日归来。

有清一代，彭玉麟文治武功、道德文章，名誉一时。其楹联以造语出奇、刚健清新、寓情于景、雅俗并兼著称，为有清十大联家之一。

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也曾题联黄鹤楼

江汉美中兴，愿诸君努力匡时，莫但赏楼头风月；

轺轩访文献，记早岁放怀游览，曾饱看春暮烟花。

1889年，张之洞52岁，任湖广总督，在此地又赋一联，那是后话。

但在所有的黄鹤楼楹联中，却有一联，当时不见作者显赫，今人亦颇多不知，却最为后人赞许者，就是至今悬挂在黄鹤楼大厅双柱上，由当代书法大家吴作人先生书写的那幅：

爽气西来，云雾扫开天地憾；

大江东去，波涛洗尽古今愁。

此联乃清人符秉忠为同治黄鹤楼所题。而同治黄鹤楼，是近1800年以来屡毁屡建中留存世上时间最短的一楼。

符秉忠，江西豫章人，同治年间武昌县令，善对联。1908年，湖广乡绅为彰显张之洞政绩，在被焚烧的原黄鹤楼遗址附近再建一楼，拟名“风度”，后依张之洞，命名“奥略”，取“恢宏奥略，镇绥南海”之意。时人将符秉忠名联再次题于奥略楼上，一联二楼。后人因此多将两楼混为一谈，也是一段趣事。

### 同治楼与奥略楼

坊间所说的“同治楼”，乃同治七年（1868年）由总督官文、李瀚章主持，符秉忠监造，在咸丰六年（1856年）兵毁的遗址上重建的黄鹤楼。

清丁守存《重建武昌黄鹤楼碑记》记载：

……（此楼）山踞龟蛇，渊临鸚鹄，巍然耸立，自唐代名流著之吟咏，千余年迭有沿革，而兹楼不废。

……至咸丰丙辰，兹楼遂付一炬。

……今虽百废渐举，而兹楼柱础空存，宏规未起，……募金重建。

……一时倡捐廉俸者，督抚司道以下，均乐于从事。

……前兵部侍郎衡阳彭公，前署广西巡抚湘阴郭公，……入资最钜。

……李公、郭公咸输白金千两……

……以武昌守黄昌辅董其事，而以候补通判汤世鏞、从九品符秉忠等驻局监理。

……越次年六月，大工成。

……是役也，计糜捐银三万余两。

……见夫大别西横，晴川对峙，广汉控三巴之峡，横江舳万棹之舟；俯而瞰焉，则烟火万家，鳞次如画，雉堞参差，冈陵起伏，熙来攘往者，蚁聚蜂屯、燕支、凤凰诸峰环列左右。

……楼凡三层，计高七丈二尺，加铜顶九尺，共成九九之数。

……上供吕祖像，仍其旧也。

……余材重建太白堂、一览亭、涌月台、留云阁、白龙池等处，以复故迹。

……盖将与海宇苍生登春台而游熙皞，不徒白云黄鹤供骚人吟客之啸咏已也。爰为记，以泐之石。

丁文1500余字，洋洋洒洒，绚丽飞扬。将黄鹤楼的人文历史、自然景观、建筑布局，尽入笔下，不失为一篇应景佳作。

丁守存，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之后，相继任户部主事，军机处章京等职。宦海得意，一片光明之际，受赛尚阿案牵连，贬职礼部，掌宴膳闲职。再后，经重臣保举，

外放湖北，先后任督鄂粮道、正三品按察使等职，直至退隐返鲁，归田吟诗。

丁是有清一代官吏中极为罕见的科技专家。《清史稿》记载：“守存通天文、历算、风角、壬遁之术，善制器。”

《重建武昌黄鹤楼碑记》乃奉命文章。以当年武昌雅士云集、人文荟萃之盛况，湖广总督李鸿章、巡抚郭嵩焘却指明由丁撰写，足见其文章迥不犹人。

令丁生前绝不可能想到的是，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同治楼毁于一场民间大火，成为近1800年以来寿命最短的黄鹤一楼。

但丁文却留了下来。文章中提到的重建黄鹤楼监理符秉忠，“爽气西来，云雾扫开天地撼；大江东去，波涛洗净古今愁。”则以联传人，名噪一时。

更令人意外的是，此联相继传楼。作者也几次被张冠李戴，有说作者是张之洞的，甚至被说成是苏东坡的，是讹传，是逸闻，也是佳话。



1908年法国人拉里贝拍摄的奥略楼照片，此时该楼落成不久，楼上悬挂的是“风度楼”匾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之洞赴京调任军机大臣。临行前，在黄鹤山临江遗址处，再题黄鹤楼联一幅：

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  
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

这与40年前，其任湖北学政时所题黄鹤楼联“莫但赏楼头风月”“曾饱看春暮烟花”相比，今日之张之洞，早已是踌躇满志了。

次年，湖广乡绅为彰显张之洞在鄂政绩，在此再建一楼，拟名“风度”。张起先来电阻止，转而又道：“点缀名胜，眺望江山，大是佳事。……此楼形势，关系全鄂，不当为一人所私。”并以“恢宏奥略，镇绥南海”之典，亲书“奥略楼”三字送之。

但“南维高拱”的奥略楼，岂可因人废文，符秉忠的“爽气西来，大江东去”，乃一时佳联，自然入选奥略楼，严格来说，这已经是该联的第三次录用了。

同治楼烧毁后，在黄鹤楼遗址处题诗的有黄遵宪、康有为等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黄遵宪来鄂公干，与客游黄鹤山遗址处，突然听到《马关条约》中台湾割让的消息，难掩心中的悲愤，作七律一首《上黄鹤楼》，其诗云：

矶头黄鹤日东流，又此阑干又此秋。  
鼾睡他人同卧榻，婆娑老子自登楼。  
能言鹦鹉悲名士，折翼天鹏慨督州。  
洒尽新亭楚囚泪，烟波风景总生愁。

此后，黄还有一首绝句题黄鹤楼，入《己亥杂诗》之六十七：

黄鹤高楼又搯碎，我来无壁可题诗。  
擎天铁柱终虚语，空累尚书两鬓丝。

此诗对“好大喜功”的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略有调侃。可惜黄遵宪生前没有看到，几年以后，临江此地再耸一楼，湖广乡绅依张之洞之意，命名“奥略”。

## 一山两楼

清末，在武昌黄鹤山临江处，曾因同时呈现于一个画面中，而被当时侨居汉口的东瀛泰西诸人，将其与从前的黄鹤楼混为一谈的，就是警钟楼和奥略楼。

岂但外夷，华夏后人中，也不乏有人张冠李戴，让人啼笑皆非。

这是两种风格及功用迥然不同的建筑。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任湖北巡抚端方在蛇山头（黄鹤山头）主持建成了“警钟楼”。这是一栋西式建筑风格的两层红楼。其功用也借鉴西人方式，楼顶西侧置一钟塔，内有大大自鸣钟，用以监督城区，发生火灾时以钟声报警，以避免火势蔓延，勿使当年同治黄鹤楼毁于一旦的事件再度重演。

该楼二层，内有一中式酒楼经营，名为“纯阳酒楼”，时人因此又将“警钟楼”称为“纯阳楼”。

不仅如此，该楼外竖立两石柱，上面刻有符秉忠的名联“爽气西来，云雾扫开天地憾；大江东去，波涛洗尽古今愁”，与此楼风范似格格不入。直到三年以后，“奥略楼”建起，楼高三层，沿用楚地楼阁风格，仿同治黄鹤楼外形，“前度刘郎今又来”，此联再次入选，悬于“奥略”之中。那是后话。

端方，晚清贵胄中集多重性于一身的人物。他是清末新政的主要推动者之一，钟情于新型教育、技术与风气。两江总督任上，创建（南京）暨南学堂（今暨南大学前身），建立图书馆，开展运动会及植树活动。在鄂期间，曾大力派遣学生留学东瀛，兴办中国第一所幼稚园，均不遗余力。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端方奉旨出国考察，深受震动。回国后，与同为考察

五大臣之一的汉人戴鸿慈，将其所见所闻共同编撰成《欧美政治要义》，详细解读各国政治制度及立宪思想，以说服慈禧。

宣统三年（1911年），端方不听其亲家公袁世凯之劝，赴川处理“保路运动”，起先主张铁路“收归国有”，态度强硬。后一路与各地乡绅、商界学界代表交流，对川民“保路运动”来龙去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态度渐渐趋向温和，然为时已晚，终究在武昌起义一个多月以后的四川资州起义中，被起义新军枭首。时年50岁。

“警钟楼”修建之时，张之洞和端方都还在武昌，两位汉满重臣为什么都不考虑在原遗址处重建黄鹤楼呢？三年后，两人又都相继离开了龟蛇江汉。张之洞“出于本官去后之思慕”，同意湖广乡绅初衷，建造“风度楼”，而不是黄鹤楼，以彰显其在鄂功业。等到再建成黄鹤楼，这已经是同治楼被烧毁百年后，也是“警钟楼”与“奥略楼”被拆迁30年以后的事情了。

### 一段与黄鹤楼有关的误传

光绪十年（1884年），同治黄鹤楼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民间大火焚毁。此后20年间，黄鹤山临江处仅存的古迹，只剩下同治黄鹤楼铜顶，和与原楼近在咫尺却有近600年历史的元胜象宝塔，俗称孔明灯。

但这不妨碍骚人墨客、时贤彦哲仍到此一游，放眼江山，凭吊怀古，留下诗词与传闻。

除了前文提到的黄遵宪外，康有为曾在此遗迹处也留下七律一首《登黄鹤楼》：

浪流滚滚大江东，鹤去楼烧矶已空。  
巫峡雨云卷朝暮，汉阳烟树带青红。  
万家楼阁随波远，百战江山扼势雄。

极目苍天帆影乱，中原万里对西风。

康睹物思景，楼烧矶空，心绪苍凉，可见诸其诗。题目中一个“登”字，而不得入，尤见心境。比他稍晚的鄂人、国学大师黄侃，也曾有一首七律《登黄鹤楼故址》，明确表明在“故址”咏叹。其诗曰：

黄鹤何年复却回？飞楼今日早成灰！  
长江毕竟东流去，词客曾经几辈来。  
洲上三春芳草绿，笛中五月落梅哀。  
虽无好句赓崔李，到处登临亦快哉。

甲午战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下野后访问中国。9月21日，伊藤在京受到光绪召见，于御座之前，与帝泛谈国事。三天后，戊戌政变，变法失败。伊藤随即离京南下，先后来到武汉和南京，专程拜访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想进一步了解大清封疆大吏们的动态。

在武昌，他受到张之洞及其幕僚们的热情款待，并为之诚挚交流。但没有想到，时至今日，网上竟然流传一段与其有关的黄鹤楼传闻，匪夷所思。经查询，该传闻最终的来源并非网上业余写手，而是专业平台及作者。

那段传闻是，伊藤博文到武昌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隆重接待，重新装饰了黄鹤楼，馆宇内外的陈设装饰及一切饮馔之类，务极华美，不限费用。伊藤博文在武昌访问两天，接待费用高达白银7.6万两，伊藤博文临行叹曰：‘金钱可惜！’”

黄鹤矶上，同治黄鹤楼都没有了，哪里可能重新装饰？同治楼建成，“是役也，计糜捐银三万余两。”何来装饰（含接待）“费用高达白银7.6万两”？由此可见，此段传闻不足为信也。

《张文襄幕府纪闻》亦未见伊藤来武

昌游黄鹤楼故址的记载。倒是记下在张府与其幕僚辜鸿铭交往对话的一段轶事。辜写道：“日本故相伊藤侯，甲午后解职来游中国。至武昌，适余所译《论语》英文告成付刊，即持一部赠之。伊藤侯谓余曰：‘闻君素精西学，尚不知孔子执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今日之二十世纪乎？’余答曰：‘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前数千年其法为三三如九，至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是三三如九，故不能改如九为如八也。’云云。”

辜鸿铭乃清末怪杰，学贯中西，自称“东西南北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他对伊藤并非刻薄的诘问，迅疾反击，其洋洋自得跃然纸上。联想到伊藤来汉之前，对推动变法失败的梁启超先生伸以援手，救其于危难之际，绝非仅仅只是对其国家利益的考量。辜对伊藤的回复，疑有失礼貌。

同样是这位辜鸿铭，时在武昌，对当时黄鹤矶下两位最显赫的人物张之洞和端方，有过一段一语中的之评论。他说：“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

作为入幕之宾，被张之洞以国士相待的辜鸿铭，公开道出以上评说，其率性和眼光足见一斑。

日后，辜鸿铭对袁世凯、锡良等人也有其独具特色的时评，容我以后慢慢道来。

后记一：五十年前，我在武昌围棋启蒙老师李益谦先生家，曾亲耳聆听李老师与汤之望先生聊过黄鹤楼及符秉忠其人其联。详见四年前拙文《闲敲棋子落灯花——“文革”期间我所认识的几位围棋老师》。不料

近年，屡屡在报刊及网上读到以讹传讹之奇闻，竟说此联作者为苏东坡、张之洞，云云。实在让人感慨万分。

后记二：我儿时居住地，与黄鹤山原黄鹤楼遗址处相距不远。记得修建武汉长江大桥以前，曾被父母带到该处游玩，“奥略楼”与“警钟楼”两楼画面，在我脑海的记忆深处隐隐可见。

后记三：我的高中同班张同学，其儿时居住地，离“纯阳楼”遗址更近，不足500米。张为人谦和内敛，曾在一家规模不小的企业任厂办主任。1980年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就读。我很晚才从我的另外一位同学那里得知，他是“纯阳气功”江湖高手，几十年来，每日都在长江大桥纪念碑下公园山坡无人处独自操练，风雨不歇。近年来我偶然得悟，张同学练功选址，原有讲究。

（夏新民：武汉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已退休）